



红旗

一九七六年第八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六年第八期 目 录

中共中央给地震灾区

人民的慰问电 (5)

短评：人定胜天..... (6)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程 越 (8)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毕 盛 (13)

在批邓斗争中加强团结青 岩 (18)

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好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党委会 (21)

集体养猪 大有可为

——安徽利辛县小叶园生产队的调查..... (26)

坚持继续革命 逐步缩小差别

——吉林永吉县阿拉底大队的调查 (29)

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中国共产党桓仁县委员会书记 王连生 (34)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个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国科学院大批判组（38）

精神可以变成物质

——批判邓小平反对工人参加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谬论

……………大连红旗造船厂党委会（45）

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本……………方 海（51）

邓小平为什么替“老戏”招魂？……………江 天（54）

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

永远坚持毛主席的建军路线

——批判邓小平在军队建设上的修正主义谬论……………沈 屏（58）

在三同中密切官兵关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济南第一团”党委会（64）

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好战备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红一连党支部（67）

加强工人民兵的建设……………上海沪东造船厂党委会（71）

科 学 史 研 究

对生命认识的两种世界观斗争……………胡雨涛（75）

杂文：莫斯科版的“升官图”

——评奇文《怎样成为部长》……………桑娄东（84）

☆八月一日出版☆



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语录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毛主席语录

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共中央给地震灾区 人民的慰问电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讯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了慰问电。电报全文如下：

河北省、天津、北京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市警备区并转唐山及其附近遭受地震灾害地区的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定能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中央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人 定 胜 天

(短 评)

七月二十八日，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地震发生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了慰问电，给正在同严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灾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充满信心，坚定沉着，英勇顽强地进行抗震救灾的斗争，全国四面八方迅速支援，大量医药、食品、衣物、建筑材料及其他物资器材源源不断运往灾区，绘出一幅团结战斗的壮丽画图，涌现出许多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动人事迹。这又一次充分说明，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胜利前进的英雄人民，任何严重自然灾害都是可以战胜的。

人定胜天，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在任何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发挥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去克服它，战胜它。毛主席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严重的地震灾害确为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使困难向顺利转化的决定条件是人的因素，是要有先进阶级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路线。我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征途中，曾经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还准备去战胜所



遇到的一切困难，包括当前地震灾害所造成的困难。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战术上重视每一个具体的困难，并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去克服它；在战略上则藐视一切困难，再大的困难都“不在话下”，都在可以克服、可以战胜之列。二十多年来，我们战胜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抵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我们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连续多年夺取了农业的丰收。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并不断总结经验，当前的地震灾害就一定可以战胜，它所造成的困难就一定可以克服。

在当前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我们的党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党，我们的人民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保证。此次地震发生后，灾区各级党委已经采取各种紧急措施，领导群众迅速投入抗震救灾的斗争。我们完全相信，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将取得抗震救灾斗争的完全胜利。任何过低估计党和人民力量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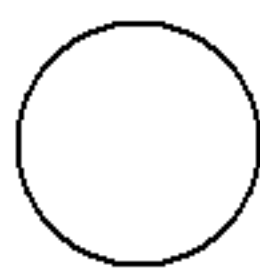
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已经和正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团结起来，奋发图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人民。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程 越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复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蓬勃发展。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新生事物，逐步完善、更加普及了。与此同时，又有许多的新生事物从各条战线破土而出，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生长。这些新生事物遍布祖国大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涌现出一批善于识别和敢于抵制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党组织和先进人物，工农兵理论队伍不断壮大，理论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艺、科技以及国际问题等方面的活动，有了新的发展。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盛开，各个文艺领域中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和较好的作品，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进一步普及提高。教育革命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续前进，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越管越好，清华、北大教育革命经验和朝农“社来社去”的经验广为传播，大学毕业生当农民已经蔚然成风，七·二一工人大学、农民业余大学到处涌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在坚持扎根反对“拔根”的斗争中前进，积累了新的经验。毛主席的卫生路线结出了硕果，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队伍已达一百五、六十万人之多，除城市医疗队上山下乡外，又出现了医务人



员同赤脚医生定期轮换的新事。科技、体育、新闻、出版等部门也出现了不少新生事物。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继续发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更加普遍，更加经常，出现了多种形式。五·七干校在斗争中巩固提高。不少地方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经过斗争的考验，更加朝气蓬勃。在最近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又涌现了大量充满共产主义精神的动人事迹。所有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胜利成果，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和成长，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各个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资产阶级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维护资本主义的旧事物，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各个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怎样打败资产阶级并最后把它消灭呢？这就要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不断批判他们要极力维护的旧事物，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社会主义的新事物。“不破不立”。不批判资本主义的旧东西，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的新事物。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党组织和先进人物越多，自觉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人们越多，复辟资本主义就越困难。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是斗出来的，无产阶级就是在批判旧事物、支持新事物的斗争中，来推动革命的前进，不断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一步一步地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实践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创造。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风格，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批判和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代表了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方向。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以要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砍大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新生事物触动了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我们，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多么重要。有的人口头上说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却看不见或看不起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把两只眼睛望着上面，等待上面交给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办法。上面的办法从哪里来呢？还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毛主席革命路



线的斗争经验中来吗！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前进，他们不满意那些严重体现资产阶级法权的旧事物束缚他们的手脚，从农业合作化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自己的革命实践创造、保卫和发展了各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在不断地革除旧事物、创造新事物的活动中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到群众斗争中去，用心寻找新生事物的幼芽，精心加以浇灌，不断铲除危害这些幼芽的害虫和莠草，使之发展壮大，推广开去，这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共产党人应当担负的任务。

近年来，广大群众创造的一些新生事物，对于限制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防止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变成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那样的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教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在总结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经验的基础上，一些工厂正在实行“两蹲点”、干部和管理人员同工人定期轮换的制度，有的地方和单位实行干部、知识分子同社员定期轮换的制度，部队干部下连当兵，等等。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大批干部自觉地同群众实行三同。这一类新生事物，就是同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着干的。各地的经验证明，干部和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革命监督，有利于干部打掉官架子，改变旧思想，真正同工农群众划等号，在思想感情上同工农兵打成一片，防止自己变成走资派，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有利于工农兵群众真正发挥主人翁精神，直接参加领导，参加管理，抓大事，讲路线，管方向，更好地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发展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样做，还有利于使干部和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从狭隘的分工中解放出来，工农兵在参加管理的实践中学会管理国家、管理生产的才能，干部在参加劳动中学会一门至几门生产技能，对于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有着深远的意义。

对于限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广大干部群众也有发明创造。例如，一些从农村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仍然拿工分，大学毕业生当农民等



新事物,它们虽然本身也还是参加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按劳分配,但已经在开始缩小由于三大差别带来的那种不平等。又如,在农村商业战线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代购代销店等,虽然本身也还是社会主义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的一种形式,但它们扩大了社会主义商业的经营范围,削弱了农村商品流通领域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对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驳斥了邓小平所宣扬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物质基础的谬论。只要领导者的思想政治路线正确,能够坚持继续革命,带头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同群众打成一片,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又注意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团结大多数人,那就会逐步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直到最后消灭它,这是要经过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全实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在许多方面还仅仅是开始。但是,这个开头很重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了这个开头,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使新生事物不断地丰富、发展、普及、提高,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工作逐步得到开展并走向深入。新生事物的产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人们对旧事物、旧传统观念、旧习惯势力的迷信。这就能够激发人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坚持不懈地同那些维护旧事物的党内资产阶级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去批判旧事物,在斗争中创造更多的新事物。这样,就会使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生气勃勃地不断前进。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能不能及时发现并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正确。领导者只有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决裂,才能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热情帮助新生事物克服前进中的弱点和缺点,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把它提到高级的程度。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新生事物的普及大造革命舆论,鸣锣开道,发动群众同危害新生事物的党内资产阶级以及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领导者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不对头,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发明、创造不感兴趣,那就不可能对新生事物采取正确的态度,就会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旧事物,新



生事物就是生长在眼皮底下也看不见，甚至压制新生事物的成长。这种事情在实际生活中不是时有出现吗？我们的领导同志，一定要在批邓斗争中努力学习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斗争中诞生的，它的成长壮大、普及提高，也必然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党内资产阶级要反对它，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要破坏它、腐蚀它，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思想也会非难它。它本身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不会止息的。党内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总是顽固地维护一切腐朽的旧事物，凶残地扼杀一切新事物。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阻碍新事物的发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5页）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本身就是吸工人、贫下中农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革命对象，斗争对象，他们怎么会支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呢？毛主席说：“**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要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前进到什么程度，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什么程度，新生事物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当前，就要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集中火力批邓。不同邓小平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作坚决斗争，清除它在各条战线的流毒，就不能真正做到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我们要通过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他在各条战线大刮右倾翻案风、否定新生事物、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来促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

毛主席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早已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了，党内外资产阶级所维护的旧思想、旧制度、旧事物，正在走向灭亡。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制度、新事物，正在蓬勃向上。看看眼前出现的这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们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历史正在创造新生事物的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中阔步向前。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毕 盛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粉碎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这是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我们取得的又一个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尽管我们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还要经历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但是，资产阶级必败，无产阶级必胜，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确定无疑的。

党内出现资产阶级，党内有矛盾，有斗争，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通过内部的矛盾斗争实现的。党也不例外。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0页）毛主席在讲到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时强调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代表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不及时揭露和粉碎走资派篡党夺权的阴谋，资产阶级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不批判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革命成果就会丧



失。事情很清楚，不斗是不行的。只有充分认识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自觉地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不承认或者回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厌倦或者害怕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采取的态度。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对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充满着必胜的信心。“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矛盾论》）新生必然战胜腐朽，革命必然战胜反动。党内资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一样，是腐朽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没落的反动势力。资产阶级把司令部移到共产党内，并不说明他们有力量，恰恰说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被我们七斗八斗，名声已经很臭，到了难以独树一帜旗帜，公开聚集起来同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较量的困难地步。党内资产阶级虽然还具有一定的反动能量和反革命的破坏力，也只不过是反映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垂死挣扎。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党内资产阶级也是纸老虎，并没有什么可怕。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他们必然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怎样发出绝望的哀鸣，疯狂地攻击和诬蔑革命的大好形势，叫嚷什么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四伏”、“积重难返”等等，根本动摇不了中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钢铁意志和必胜信心。

毛主席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是我们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

我们的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内出现资产阶级，并不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也丝毫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辉。



相反，我们党敢于公开承认和揭露党内资产阶级，正说明我们党坚强有力量。“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们党内占主导地位，并且日益深入人心，这是我们党能够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根本保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被他们保护下来的叛徒、特务，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我们党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并在自己长期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我们党能够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五十多年来，我们党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次又一次跳出来妄图分裂我们党，都没有分裂成。相反，清除掉这些革命内部的“蛀虫”，全党更加坚定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历史的经验使我们确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是我们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的“大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搞复辟倒退，反对革命，得罪了大多数，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和唾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巨大力量。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曾嚣张一时，人民群众一起来，就使他们一个一个倒台了。亿万人民群众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参加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实践，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我们完全相信，无论党内资产阶级变换什么手法，玩弄什么阴谋诡计，必将遭到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人民群众的揭露、抵制和批判。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不就有一大批普通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青年学生和基层干部，挺身而出，首先起来抵制



和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成了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英勇斗争的闯将吗？这种情况令人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中，从人民群众里面必然会涌现出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骨干，造就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承下去，进行到底。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关于重庆谈判》）无产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不同于盲目乐观，就在于我们懂得这个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盲目乐观者看不见或看不清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规律，他们很容易麻痹松懈，陷入阶级斗争熄灭论，或者在革命遇到曲折时又陷入悲观失望。我们不仅要看到革命的光明前途，树立必胜的信心，而且要看到革命道路的曲折，增添革命斗志，准备以百折不回的毅力，自觉地为争取光明的前途而斗争。没落的阶级，虽然象失去生机的大树一样，根基已经腐朽，但它却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要用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生存，进行垂死挣扎。旧制度总要经过较长历史的反复才能葬入坟墓。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任何一个新兴的阶级战胜腐朽没落的阶级，都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斗争过程。中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从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其间三百七十多年，经历了多次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斗争；新兴地主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后，这种斗争又延续了许多年。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法国和美国分别经历了四十八年、八十六年和近百年的曲折斗争。历史上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尚且如此，无产阶级革命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当然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经历更多的曲折和反复。毛主席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只要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国际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还存在，“走资派还在走”就是必然的。一两个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垮台，并不意味着党内资产阶级以至整个资产阶



级的彻底灭亡。他们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必然会重新集结反革命势力，改变反革命策略，继续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怎么可以幻想阶级敌人会改变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牛鬼蛇神不往外跳，新老资产阶级不搞阴谋破坏呢？怎么可以幻想经过一两次、三四次斗争就可以把整个党内外资产阶级彻底打垮，把旧社会的垃圾全部扫地出门呢？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次接一次地展开，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值得烦恼。“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敢！”革命斗争中的反复和曲折，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可以锤炼意志，激发热情，增长才干，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对现实斗争和革命前途是不是采取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归根结底，是个世界观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革命乐观主义的思想基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则是一切悲观论调的认识论根源。我们有些好心的同志，总是幻想革命队伍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笔直又笔直，因而一遇曲折，就忧心忡忡，看不到光明灿烂的前途。他们分析革命斗争的形势时，往往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得出了不切实际的阶级估量。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表面性和片面性，分不清事物的本质与现象、主流和支流。这样，他们在分析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前途时，就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散布的悲观论的思想影响。对待自然灾害也必须采取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自然灾害不可怕，地震也不可怕。“人定胜天”，这是伟大的真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者，就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为此，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经常扫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这样，才能振奋革命精神，坚定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胜信念，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在批邓斗争中加强团结

青 岩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在继续深入开展。在斗争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加强了党的团结和革命队伍的团结，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党的团结总是和路线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政治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必然搞分裂，破坏党的团结。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只有经过同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搞分裂的路线和阴谋进行坚决斗争，才能取得。因此，每经过一次大的路线斗争，都使我们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更富有战斗力。当前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反映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和要求，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他必然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社教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又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更加明确地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



性质、任务和对象，同时，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分裂革命队伍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资产阶级，来自走资派。邓小平不是已经作了充分的表演吗？他重新工作不久，就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了实现他的罪恶目的，就大搞阴谋诡计，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挑拨党群关系和新老干部的关系，破坏军民团结、军政团结。这就说明，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我们要巩固和增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就必须深入批邓，同党内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讲团结，当然应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第一条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才有团结的基础，和修正主义者有什么团结可言呢？相反，同他们决裂得越彻底越好。我们绝不同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讲团结。对他们就是要斗。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而且只有坚决同他们作斗争，才能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在当前，只有集中火力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分清路线问题上的大是大非，革命队伍本身才能思想一致，目标一致，步调一致，加强团结，共同战斗。许多先进地区和单位的经验证明，对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越批，方向越明，越批，路线越清，越批，团结越好。那种害怕深入批邓会影响革命队伍团结、造成混乱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就是为了发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在我国革命过程中，毛主席始终强调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群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中,同样要注意团结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翻案不得人心,他们是十分孤立的。只要我们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就一定能够团结大多数。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邓小平,指向党内资产阶级。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犯了错误特别是犯有路线错误的同志,也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努力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端正立场,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决裂,带头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在斗争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对于革命群众内部存在的争论和分歧,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消除隔阂,团结战斗,集中火力批邓。批邓,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一场重大斗争,是革命的大局。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在批邓这个总目标下团结起来,绝不要由于纠缠枝节问题而转移或冲淡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大方向。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走资派企图用挑动群众斗群众来转移斗争大方向,这个历史经验我们必须牢记。

毛主席指出:“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论联合政府》)为了紧密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促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更加茁壮成长,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拉山头、搞串连,不要搞战斗队。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使各项工作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任务还是艰巨的,复杂的。我们要团结起来,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再接再厉,乘胜前进,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好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党委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基础上，我们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于一九六九年建立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从班组、车间到全厂的“五员五组”三级管理网，发挥了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作用，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蓬勃发展。在当前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回顾七年来我们坚持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实践，深刻体会到，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关系到办企业的方向路线的大事，是使企业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调整人们相互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项重要措施。

几年来，工人参加企业管理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实行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建立起组织，订立点制度，是比较容易办到的，要使它不流于形式而真正发挥作用，就不那么容易了。这里关键在于党委“一班人”认真看书学习，坚持同修正主义斗，同旧的传统观念斗，不断提高对工人参加企业管理重要意义的认识，把路线搞端正。

工人参加管理，是单纯管生产还是首先管路线、管方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范围问题，而是关系到企业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工人参加管理能否坚持和发展的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文化大革命前，我厂曾在班组设立过八大员，但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八大员的工作被局限在班组生产事务上，工人仍然无权过问企业的方向路线问题，这样不仅工人群众对企业的领导权被剥夺了，而且企业领导人也犯了错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认识有了提高，但是，那种认为“工人参加管理，管管生产就行了”的思想，还常常表现出来。早在开始酝酿



建立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组织时，就有人主张只建立管理生产业务的组织；在工管组建立以后，有的同志在依靠工人管生产业务方面抓得比较具体，而在依靠他们管路线、管方向方面则较多地停留在口头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几年来，我们组织各级干部、广大职工反复学习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管理两重性的论述和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等一系列教导，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首先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斗争的重点，就是那些与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的党内走资派。因此，工人参加管理，必须首先协助和监督党委把好企业的方向路线关，使企业领导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企业的领导权被走资派所篡夺。这是依靠工人管理企业的根本，丢掉这个根本，就谈不上坚持和发展工人参加管理的问题。

事实充分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工人群众觉悟提高了，他们善于识别修正主义路线，敢于同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能及时发现和批评领导在路线上的偏差和错误。一九七三年厂里搞基建施工，有的同志为了赶进度，就采取了“包干到人”的小包工的作法，早完活早休息，以此来调动所谓工人的“积极性”。工人管理员发现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物质刺激”的变种，是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表现，及时向党委提出了批评。党委接受了工管员的批评，引导干部、工人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在工管员的带动下，抓革命、促生产，一项原订半个月完成的施工项目，三天就完成了。这件事，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广大工人群众都来管企业的方向路线，对于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使企业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啊！”

为了保证工人更好地管理企业的方向和路线，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其中主要有厂工管组长定期参加厂革委会会议，对全厂的大事有领导权；组成工人检查团定期检查各级领导的学习、劳动、工作和执行路线的情况；凡是涉及全厂的大事，党委在作出决定之前都要找工人管理员充分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让工人当家作主。正是由于党委依靠工人群众管路线、管方向，所以当邓小平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全面整顿”，妄图整掉工人参加管理



这一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时，我们在广大工人的支持下，比较好地抵制了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跟他对着干，保卫和发展了工人参加管理这一新生事物。

坚持工人参加管理，还必须不断地批判“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解决依靠工人阶级是全心全意还是三心二意的问题。有的同志错误地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建立了工人参加管理的组织、制度，依靠工人办企业的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事实并不是这样，实行工人参加管理的过程中，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比如有一段时间，厂内生产出现了不平衡，有的车间积下大量半成品，产品出不了厂，影响了合同计划的完成和资金的周转。有关科室调整生产计划，加强生产调度，调整劳动组织，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情况没有显著的好转。工人管理员了解到这一问题后，向党委提出建议，组成以工人为主的、有领导干部和科室人员参加的调查组，共同解决这一问题。有的同志听了这个建议，连连摇头，说：“科室的干部整天专门干这个工作，对厂里的生产安排闭着眼睛也能摸得清，工人搞搞调查能解决得了什么问题。”在多数同志的主张下，党委采纳了工人的建议。在党委的领导下，调查组对产品投产计划，各工序的完成情况，做了详细的了解。他们发现积压下来的大多是产值低、费工多的产品。显然，这不是单纯的生产安排问题，而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流毒的表现。这样就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调查组向党委汇报了调查结果，并提出了解决措施。根据调查组的意见，我们改变了就事论事的做法，首先组织职工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并辅之以一些必要的措施，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扭转了生产上的被动局面，资金周转情况也大大改善了。

我们抓住这件事，联系思想实际，进行了讨论，为什么有的同志对工人搞调查信不过呢？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主要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工人管理企业的能力不完全相信，认为工人提提意见还可以，搞实际管理还是主要靠专职干部。有的认为，事事都要找工管组商量，多了个婆婆，太麻烦了；还有的干部只赞成工人分担自己的管理工作，而对于工人监督和管理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却有反感。由于存在着这些错误思想，我们有些同志尽管口头上也常讲要依靠工人群众，但在行动上却往往不依靠。正象工人所批评的那样：“你们对工人参加管理是



喊在嘴上，写在纸上，就是没有放在心上。”为什么没有放在心上呢？根子就是“专家治厂”、“上智下愚”的流毒没有肃清。经过这样的分析，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不断地批判唯心史观和修正主义路线，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才能把工人群众看作企业的主人，而不是当做“拐棍”，才能把工人参加管理当作百年大计，而不是当作权宜之计，才能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而不是时而抓得紧，时而抓得松，使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流于形式。

正确认识和处理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的关系，也是坚持工人参加管理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专业管理人员同群众管理人员的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在社会主义企业中，虽然专业管理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一部分人固守于一定的专业管理范围，多数人成为被管的对象，这反映了旧的社会分工的痕迹，是企业中人们相互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因此搞好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的结合，就要限制人们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学习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工人参加管理为干部实行三同创造了条件，干部也只有实行三同，才能有效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搞好专群结合，促进工人参加管理的发展。

从我厂技术工作来看，文化大革命前，工人无权过问技术工作，技术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时工人要搞一项技术革新，要经“五定”过“四关”，压抑了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实行工人参加管理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但是，由于有些技术人员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搞设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所以总是和工人管理员貌合神离，结合不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不断对技术人员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搞好专群结合的关键是：专业管理人员要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参加劳动，不断改造世界观，转变思想感情。如果坐在办公室等待，是一辈子也结合不好的。他们转变思想作风，认真和工人搞三同，向工人学习，和工人想到了一起，对工人的感情加深了，工作上也就拧成



了一股劲，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发展，使很多老大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七车间生产的折叠圆凳，安装铁活需要垫六个垫圈，操作起来很麻烦，负责技术质量的工人管理员早就提出对这一工艺进行改革的建议，由于我们的干部浮在上边，参加劳动少，和群众想不到一起，一直把它拖了下来。后来，厂里主管技术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到这个车间蹲点，听取了工人群众的意见，很快实行了这项改革，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效，节约了原材料，仅垫圈一年就可节约一吨多。

为了搞好专群结合，我们还不断地破除旧的企业管理制度和办法，建立起一些适应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新制度和办法。例如从组织形式上，厂级和车间工管组由工人担任组长，并分别由对口的专业科室负责人和车间的有关管理人员担任副组长。在工作制度上，专业管理人员定期向对口的工管组汇报工作，遇事发扬民主，主动找工人商量，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并对工人管理员进行必要的业务指导；工人管理员在完成八小时内的生产任务的同时，积极参加企业的各项管理工作。这样，就在全厂形成了集中统一、专群结合的民主管理，体现了干部和工人之间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

在实行专群结合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同群众管理人员之间发生一些不同意见是不可避免的。在解决矛盾时，我们不是采取简单的由谁来拍板的作法，而是领导干部、专业管理人员同群众管理人员一起，经过充分讨论，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谁的意见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按谁的办。

在工人参加管理这一方面，我们厂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斗争没有完，如果我们不认真看书学习，不抓紧世界观的改造，还会犯错误。在这一方面，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课，他把工人参加管理这一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竭力进行破坏。他污蔑工人参加管理把企业搞“乱”了，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叫嚷对工人要管得“严一些”。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在企业中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提高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自觉性，使我们的企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



集体养猪 大有可为

——安徽利辛县小叶园生产队的调查

小叶园是一个只有十八户的生产队。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短短的四年内，使养猪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现在，生猪饲养量六百二十七头（其中集体养的五百七十七头），平均每户三十四点八头，每人九点九头，每亩四点三头。猪多带来了肥多、粮多、贡献多、储备多、机械多，改变了生产条件，发展了集体生产。一九七五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零七十六斤，今年小麦单产达到七百五十六斤。近两、三年来，添置了拖拉机、柴油机、脱粒机、粉碎机、榨油机等许多农副业机械，还发展集体养鱼十九万尾。公共积累不断增加，社员生活逐年改善。

小叶园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一个穷队。那时，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阶级敌人捣乱，人心搅散了，土地搞荒了，生产上不去，年年吃国家回销粮。有些人搬了家，原来全队二十七户只剩下了十八户。但是，这里的贫下中农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改选了领导班子，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他们下定决心，发展集体养猪事业。

集体养猪，队里没有钱，猪从哪里来？他们想办法赊了一头母猪，当年就下了三十头小猪。这时候，有少数干部和社员怕饲料不好解决，怕建圈有困难，怕



病疫难预防，嫌养多了。有个富裕中农宣扬“官房漏，官马瘦，集体养猪不长肉”。针对这些情况，队委会组织群众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指示，开展“为谁养猪”、“为啥养猪”的群众性的大讨论，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大家懂得猪多、肥多、粮多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农业要上去，养猪业必须大发展的道理，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在上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他们迎着风浪闯，养猪事业的步子越迈越大。一九七五年，生猪饲养量比一九七二年增长十一点四倍。

集体养猪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方向对。但在这个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很尖锐的。阶级敌人以及党内资产阶级都反对和破坏集体养猪。社员们有发展养猪的要求，但许多人没有集体养猪的习惯。有些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人甚至对集体养猪抱有很大的反感。小叶园生产队在发展养猪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旧传统习惯，坚持以公养为主，并鼓励社员家庭养猪，使集体养猪一直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七三年以来，他们向国家共交售肥猪三百八十三头，没有私杀过一头；收入四万五千二百七十元，大都用在发展集体生产上，使集体经济越办越兴旺。

小叶园的集体养猪事业发展这样快，人是决定的因素。毛主席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小叶园生产队为了加强对养猪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干部、社员代表、饲养员参加的畜牧业领导小组，并注意选拔那些政治思想好、热爱集体、热爱养猪的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组成饲养小组。对饲养员经常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每天晚上坚持学政治、学技术，使他们逐步做到：一细，细心饲养，摸清每头猪的脾气；二爱，爱集体猪场，爱为集体养猪；三勤，心勤、手勤、腿勤；四不怕，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麻烦，逐步形成一支又红又专的饲养员队伍。有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放弃大学不上，一心扑在养猪事业上。寒冬腊月，母猪下仔，他把瘦弱的仔猪揣在怀里，做到头头成活。社员们说：“有了这样好的饲养员，就没有养不好的猪。”



在猪病的防治上，饲养员既是防疫员，也是赤脚兽医，不仅会养猪，而且能防疫、治病。他们以草药为主，并且采用调剂饮食的办法，巧妙地防治了猪病。几年来，从来没有病死过一头猪，保证了猪的健壮成长。

小叶园总共有一百四十五亩耕地，一亩地要养四、五头猪，饲料从哪里来？他们的办法是土办法，穷养猪。集体养猪刚开始，大家想把猪养好，喂了很多精饲料，猪长得并不快。后来，队委会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的指示，总结经验，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多养猪，必须大搞青粗饲料，立足于穷养猪。他们就地取材，统筹安排，实行“养、种、采、藏、制”五种办法，解决了饲料问题。养，充分利用沟、塘、水面放养水浮莲、水花生、水葫芦等；种，除在家前屋后、沟旁路边种青饲料外，还固定八亩青饲料基地，利用二十亩冬闲地轮种套种，四季不断青；采，发动社员割野草，挖野菜，捞杂草，采树叶等；藏，把各种农作物秸秆以及豆叶角皮和谷糠收藏好；制，把收集起来的各种青粗饲料打浆、粉碎、发酵，制成盐化或醋化饲料。以青代精，以粗成细，节约了大量粮食，和一九七二年相比使养猪成本降低了百分之六十。

他们艰苦创业，不当伸手派。没有猪圈，就一把泥、一把草地自己动手建，用破车轱辘、破车厢板做圈门。直到现在，还是土猪圈，没有大手大脚地搞那些不适用的洋东西。他们深深体会到，只有坚持穷养猪，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农牧业生产。过去，有人担心猪吃人的粮，现在懂得了养猪不但不是浪费粮食，而且增产粮食。他们说：“猪圈就是肥料厂，猪圈就是小粮仓，猪圈就是小银行。”

毛主席指出：“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小叶园的干部、群众是自觉地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发展养猪事业的。

中共安徽省委 联合调查组
中共利辛县委



坚持继续革命 逐步缩小差别

——吉林永吉县阿拉底大队的调查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我国广大农村更加生气勃勃，新生事物到处可见。阿拉底大队的发展变化，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位于松花江畔的阿拉底大队，是个朝鲜族大队，有六个生产队，三百六十户，两千零五十四口人，五千七百亩耕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里资本主义的东西大大削弱，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生长。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越来越高，干部和社员的关系更加密切，集体经济日益壮大，贫富等差别逐渐缩小。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十年来，两年上“纲要”，两年过“黄河”，六年跨“长江”。去年平均亩产九百二十六斤，每人向国家交售粮食一千六百六十九斤。公共积累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万元增加到一百八十万元。文化大革命前，这里只有一个小铁匠炉，现在办起了农具厂、机砖厂、水泥瓦厂、化肥厂、多种经营场。全大队有汽车三辆，拖拉机、插秧机、脱谷机等农业机械三十七台，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社员收入逐年提高，生活越来越好。今日的阿拉底，人们精神振奋，村里景象一新，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画图。

阿拉底大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步子迈得这样大，主要原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采取有效措施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了差别，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邓小平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阿拉底大队的发展变化，是对他这个谬论的有力批判。事实证明，不是有了什么象邓小平所说那样的物质基础才能限制资



产阶级法权，而是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制造这个谬论的目的，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大队的干部过去曾经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归集体了，只要好好发展生产，实行按劳分配，大家就会共同富裕起来。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生产资料归集体以后，仍然存在着不少差别。队与队之间，有的家底厚，有的还要国家贷款。社员之间，有的劳力多，收入就高，生活就好，而有的社员生活却很困难。在干部和社员之间，也有些不平等的地方。怎样对待这些差别呢？他们觉得，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要消灭三大差别，面前摆着的这些差别绝不能让它扩大。如果扩大了，旧社会那种“一家富，千家穷”的历史就会重演，资本主义就要复辟。所以，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下决心逐步缩小差别。

他们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又注意采取了一些缩小差别的办法。首先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扩大公共积累，兴办集体福利事业。他们根据生产发展情况，适当提高大队提留的比例。在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用公共积累建立了能透视、能化验、能做简单手术和设有病房、产室的合作医疗站，办起了幼儿园和十年制学校，社员治病、妇女生孩子住院以及小孩子上幼儿园和学生念书，基本上不花钱。他们还有计划地盖起了七十九栋砖瓦结构的社员住宅，有三分之一的社员住上了新房，每年只花很少的房费。二是适当缩小工分等级差别。三是合理安排劳力，做到人人有活干，个个有收入。例如，让体弱和有残疾的社员做服务性工作，既替换出强劳力，又使他们得到一定的收入。四是注意解决贫困户的问题。采取这些措施，缩小了社员之间的贫富差别，困难户减少了，欠款户没有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社员有了存款，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员们更加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

随着大队企事业的发展，非农业生产人员逐渐多起来，社员劳动分工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怎样防止产生新的分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大



队企事业中有的人受习惯势力的影响，往往跟国营企事业单位比报酬、比待遇，提出要和从事农业劳动的社员有差别。大队的领导班子认为，我们将来最终的目标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现在企事业发展了，如果差别反而扩大了，那不是前进了，而是把方向搞错了。他们说：“社员分工变了，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变，集体事业发展了，差别不能扩大。”经过社员多次讨论，他们规定：一、企事业人员和其他社员一样，实行评工记分，工分标准一般不超过同等劳力的水平。个别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的工种，给一定数量的补贴。工作时间也和从事农业劳动的社员一样。二、实行亦工亦农的制度，做工的也要种田，从事脑力劳动的也要参加体力劳动。医生、护士、教师和大队的会计、出纳员、广播员等，都参加一定的农业劳动。工厂的工人，农闲时做工，农忙时务农。汽车司机出车回来也下水田赶牛犁地，社员说他们既是汽车司机，又是“牛车司机”。三、实行企事业人员和农业第一线社员的轮换制度。经过一年或两年的时间，让一部分企事业人员到生产队去当社员，另调一部分社员到企事业单位去。近几年来，在全大队一百四十多名企事业人员中，包括汽车司机、拖拉机手、工人、医务人员、教师等，已经轮换了三十四人。实行这些措施，既防止了非农业生产人员由于分工不同而产生优越感，也培养了一批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亦工亦农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现在，他们三辆汽车，有七名驾驶员，四台大型拖拉机，有十二名拖拉机手。

这个大队的干部，不断清除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坚持和社员搞三同。他们认识到，自己既是干部，也是普通社员，如果和群众分出等来，发展下去就会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里过去就有那么一个干部，原来跟社员同甘共苦，分不出两样，后来滋长了特权思想，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了，慢慢地腐化堕落下去，被贫下中农赶下了台。他们牢记这个教训，一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白天劳动，晚上工作，一年到头总是比社员起得早，睡得晚。雨天的夜晚，大队干部就拿着铁锹到地里，随时查看水情。逢年过节，他们就分别到饲养所和多种经营场顶班劳动，把社员替换下来，让他们回家休息。大队党总支书记金龙九，六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但他一直带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有一次，他带病到地里插秧，晕倒在池埂子上，社员把他送到卫生所，他醒过来又马上回到地里



和社员一样干。有人说：“你这把年纪了，身板又不好，也该歇歇了。”他说：“咱起的是共产主义的车票，不能到社会主义就下车。”每年社员都提出给大队干部记一等劳力工分，他们坚持要中等劳力的报酬。

这个大队的干部，甘当贫下中农的勤务员，不用职权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他们说：“当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利用职权谋私利的权利。”队里分粮、分柴、分饲料，他们都和社员一样。几年来，队里先后推荐十几名青年上大学，没有一名是大队干部的子弟。集体盖了那么多新房子，都先分给了军烈属、五保户、老贫农和人口多住房条件差的社员。大队十三名领导成员，只有一名因为是烈属，房屋破漏，住上了新房，其他人都住着原来的旧草房。金龙九是复员军人，家里人口多，房子狭窄，儿子又要结婚，论条件早该住新房。可是，几次分给他，都拒绝了。他说：“咱大队三百六十户，分房子就把我排在第三百六十号吧。”

阿拉底大队能够坚持继续革命，逐步缩小差别，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导。这个大队的政治夜校，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越办越好。有老年班、壮年班、青年班和妇女班，每周学习两次，既学政治，又学文化。不管农忙农闲，风天雨天，从未间断。大家觉得，不学革命理论，说话没根，办事不稳，容易搞错方向。所以，越学越爱学。全大队社员已经普遍学习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和《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马列著作。干部学得更多些。从去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他们进一步搞清楚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要限制和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在工作中更好地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他们的学习，紧密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大队办的工厂里，有的技术工人，总觉得自己有技术，创造的价值比别人大，应该工分高，待遇好。针对这个问题，大队党总支组织大家学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一段论述：“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学习技术的“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1页）结合学习，引导大家讨论自己的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大家认识到：我们的技术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用集体的钱培养出来的。有了技术应该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而不



应该把技术当作私有财产，向集体讨价还价。通过学习，人们提高了觉悟，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

毛主席说：“**不斗争就不能进步。**”阿拉底大队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也是不断斗争的结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差别，不单纯是采取措施的问题，这里边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他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在前头。他们用本大队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使大家认识到缩小差别的好处，扩大差别的害处。土改后，在刘少奇“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这里有一户富裕农民，为了发家致富，放债，雇工，很快成了新富农；有的户则由于劳力少，人口多，生活困难，不得不出卖土地，去打短工，受剥削。大家看得很清楚，差别扩大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分化为不同的阶级。社员们说：旧社会同是受剥削的阶级弟兄，今天决不能再形成新的雇佣关系。大家提高了觉悟，积极支持缩小差别，扩大公共积累。有的户还主动地把暂时不用的钱，放在队里储存，用于扩大再生产，兴办集体福利事业。

为了逐步缩小差别，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他们还积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新民主主义论》），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通过树立先进典型，表彰好人好事，大造革命舆论，使热爱集体、不计较报酬蔚然成风，干部和社员自觉地“**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2页）。农具厂有个老铁匠。抡锤打铁，常常干到深夜，从来不计较报酬多少。打铁时衣服烧坏了，也不向队里要补助。有人说：“铁匠干活多，该多给工分。”他说：“别人种地，我打铁，都是社员，为啥多给工分？”有些女社员，利用劳动休息时间，为队里洗刷水稻育苗用过的塑料布。青年们自动去修路、栽树，进行义务劳动。一心为国家、一心为集体的新人新事，到处可见。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这个大队总结了自己的实践经验，认识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任务，他们决心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彻底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继续努力作战。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市委、永吉县委调查组



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中国共产党桓仁县委员会书记 王连生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深刻批判了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党内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更加认清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反动实质。我联系历史和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深体会到：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努力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我原来是农村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近几年来走上了县委领导岗位，一九七四年担任了县委书记。当了县的领导干部比起基层干部来，毕竟是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坚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继续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对于这个关系到是否坚持继续革命的重大问题，我当时想了很多很多。回顾从农业合作化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我亲眼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广大党员、干部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同工人、贫下中农一道继续革命，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可是，也有少数人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了，有的甚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变为或正在变为吸工人和贫下中农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受到群众的批判。什么原因呢？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些人搞修正主义而不搞马克思主义。他们竭力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拚命拉长自己和群众之间的距离，结果使自己同工人和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



等价交换。”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是分等级，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坚持继续革命，紧紧跟上工人和贫下中农前进的步伐，就要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那种比群众高一等的错误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比群众高一头，和群众分出个“等”来。为此，我走上县委领导岗位以后，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一是保留农村户口；二是记农业工分；三是吃农业户口粮。同时，我还努力做到：职务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地位高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不丢；权力大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宗旨不忘。

我感到做了领导干部坚持同贫下中农一样，好处很多。头一条是有利于自身革命化。和贫下中农不分等，坚持实行三同，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同他们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就会对我不隔外，把我当成他们的知心人，这就使我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而不会沾染官僚主义的灰尘。再一条是有利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各项工作。我长期生活在基层，缺乏做领导工作的经验。我和贫下中农不分等，他们自然对我信得过，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对我掏，有什么困难事都愿意找我办，我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他们也会及时指出，这样，就使我耳聪目明，干起工作来有把握，不愁干不好。

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这不仅因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把资产阶级法权当做命根子加以保护，一听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就反感，而且长期以来的剥削阶级的偏见和资产阶级思想在一部分人头脑里还有相当大的影响。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旧的传统观念斗。我当县委书记以后，坚持不拿工资，同社员群众一样拿工分，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赞扬，有些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连生不论当多大干部，都是咱们堆里的人！”“当县委书记还是拿工分，真是当了‘官’不象官。”我感到这是对我的鼓励和教育，也是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大力支持。

可是，也有一些人对我的行动不大理解，他们认为，当了县委书记把拿工分改成拿工资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总觉得这个看法不对头。我是庄稼人出身，即使当了再大的“官”，也不能和贫下中农闹出个两样来，这才是理所当然的。在存在着阶



级的社会里，理，从来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理，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理，这两家的理什么时候也捏不到一块儿。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看来，高官就得厚禄，升官就得发财，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因此，他们连做梦都在想当大官，拿大钱，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并且把这种丑恶的思想作为他们的人生哲学。从封建地主阶级的县太爷到国民党的县长大人，不都是信奉这一套吗？我们共产党人正好相反，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道理。毛主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当成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决不可以闹地位、争待遇，更不可以去追求高官厚禄。过去，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并没有实行什么薪金制，也没有搞什么等级，更谈不上有什么优厚的物质待遇，“**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井冈山的斗争》）。但是，我们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天，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我们只有义务为革命多做贡献，而没有权利向人民多取报酬。我感到做一个手有老茧、腿有泥巴、出没于田间地头、置身于群众之中的“工分书记”，是很光荣和幸福的。一些人至今还觉得当了官就得有优厚的物质待遇，这说明他们还没有从剥削阶级的陈腐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的眼界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框框，那么，他们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行动不理解，就毫不奇怪了。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的人总是从等级观念出发，常常为领导干部这也“照顾”、那也“优待”。他们有时以“关心领导生活”为名，今天送吃的，明天送穿的，后天送用的；有时打着“关心子女前途”的旗号，在招工、招生等方面，有意为领导干部子女进工厂、上大学创造种种方便条件。有些同志对此心安理得，甚至还去寻找这种“照顾”和“优待”。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我当县委书记不久，就碰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七四年秋季征兵，上级给我们县三个女兵名额。县有关部门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给了我原来所在大队一个名额，目的是照顾我的大女儿当兵。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心里很不安，连忙赶回家里对女儿做思想工作。我对女儿说：“全县适龄青年好几千，论条件比你强的也不少，为什么



偏偏选你，还不是因为你爸爸是县委书记！要是在战争年代，爸爸头一个送你去参军，现在名额少，大家都想去，你作为干部子女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有半点特权思想。”经过一番思想工作，我的女儿愉快地接受了我的意见，决心扎根农村干革命。去年，她由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实行“社来社去”的丹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常常听到一些人讲：“人家主动送上门来，盛情难却，官不打送礼的嘛！”有这种看法的人总是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看不到在表面盛情的背后隐藏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进行捧场，是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如果对这种“盛情”接受多了，就会上大当，在资产阶级法权捧场面前打败仗。我们革命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剥削阶级的官老爷，对于资产阶级的“盛情”、“送礼”之类的东西，一定要给它拦头一棒，坚决把它打回去。只有这样，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才能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得到发扬光大。

有些人认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话好说，临到自己头上就犯愁，“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感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很重要的一条是领导带头，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出样子。所谓愁，就愁在领导不带头。领导一带头，事情就好办。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提高了，自己的刀就能削自己的把。我对自己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用无产阶级之刀削自己的资产阶级之把的过程。一个领导干部在这方面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人一身干净、“两袖清风”，还要带动一班人当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逐步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旧土壤。自从去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我们县委“一班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以实际行动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决裂。我和县委其他领导成员一起，带领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终于刹住了长期存在的破坏森林资源的歪风。我们还针对城镇干部中强占公房、大量占用公款等问题，向资本主义倾向连续发动进攻，使资产阶级歪风大为下降，无产阶级正气大为上升。领导带动了群众，革命促进了生产。去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五百五十斤，第一次跨过了“黄河”，摘掉了长期吃返销粮的帽子。我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做得还很不够，需要继续努力。我决心更加刻苦地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坚决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事业奋斗一辈子。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个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中国科学院大批判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了全面贯彻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他炮制了一系列的反动文件。大毒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直接宣扬“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反动纲领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妄图在经济领域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复辟资本主义的。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亲自挂帅，亲自指挥，炮制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是一个在科技界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邓小平有个自白：“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妄图通过推行这个《提纲》，达到从科技界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目的。这充分说明了《提纲》在邓小平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又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指示，击中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要害，也击中了他一手炮制的《提纲》的要害。尽管这个《提纲》前后易稿五、六次，想方设法“磨棱角，保原则”，增加所谓“理论色彩”即欺骗性，然而，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一剖析就可以看出，



《提纲》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从头到尾贯穿着一条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黑线。

在《提纲》炮制过程中，邓小平曾“指示”说：“国家嘛，科研要走在前头。”《提纲》忠实地把它写了进去。在一开头论述科研工作的“方向”时，它根本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不提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孤立地翻来复去地大讲所谓“四个现代化”，而在“四个现代化”中，又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提到了决定一切的地位，说什么“在科学技术上没有有一个大的飞跃，就难以实现”两步走的宏伟目标，因此“科研要走在前面”，还说什么“石油工业的突飞猛进，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里提出了一个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还是科学技术决定一切？我们应当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摆在首要地位，还是应当把所谓“四个现代化”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它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从属于上述这个根本方向的。脱离这个根本方向的“现代化”，只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著名论断，已经形象而深刻地回答了什么“走在前头”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发展，带动了包括生产和科学技术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证明：抓好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生产与科学就能不断跃进。邓小平及其炮制的《提纲》鼓吹什么“科研要走在前面”，就是要以科研取代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火车头”。这种“技术决定一切”和“科学至上”的谬论，是地地道道的唯生产力论。《提纲》把“石油工业的突飞猛进”的原因归结为科研“走在前面”，这是用唯生产力论抹杀“工业学大庆”的意义，完全歪曲了大庆工人阶级“两论”起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经验。当然，包括地质力学在内的我国科学技术上的一系列新成就，在石油工业的突飞猛进中发挥了作用。但是，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导，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没有大庆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哪里会有“石油工业的突飞猛进”？地质力学等



科学技术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又怎么可能在寻找石油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只要回想一下解放以前地质力学所处的境地和所遭受的命运，就可以很有说服力地回答：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走在前面”，自然科学上的成就是根本不可能为人民服务的。贩卖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者妄想从这里捞根稻草，真是选错了对象。

谈到“任务”时，《提纲》同样把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根本任务，抛到了九霄云外。在他们歪曲地大量摘引毛主席的语录时，唯独不写上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导，这决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妄图阉割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灵魂，把人们引上修正主义的邪路。他们本来是处处否定和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而在宣扬所谓“新的形势”时，却一反常态地说什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从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扫清”了。在他们看来，科技战线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了，剩下的只是“重大科研”、“新兴科学技术”和“基础科学”一类的事情了。这完全是居心险恶的骗人鬼话。在科技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击了科技领域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旧基础、旧传统、旧思想。但是，“**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在这里，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大量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仍然严重存在，资产阶级办科学的旧传统还有很深的影响，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仍然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所以修正主义思潮还有相当的基础和市场，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党内资产阶级，那些保护资产阶级学阀垄断、保护科技领域中一切陈旧“神物”、力求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走资派，还会给科技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提纲》的炮制者高喊“扫清了道路”之日，就正是他们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妄图把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之时。正如毛主席尖锐指出的：“**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邓小平也是如此。就在他大刮右倾翻案风，一直到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前后，科技领域一时乌云翻滚，浊浪四起，**阶级斗争**何曾熄灭！《提纲》宣扬一次“扫清”的谬论，完全是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烟幕。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垃圾，必须年年扫，月



月扫，天天扫，一次大扫不行，还要扫它二十次、三十次，一直扫到阶级消灭为止。

《提纲》炮制者到处宣扬一种“科学技术特殊论”，说什么科技战线是个“特殊领域”，“不能把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口号套到科技界来”。就是根据这种“特殊论”，他们明目张胆地提出了“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特殊”口号。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要，真可谓“特殊”到家了！试问，你们不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吗？不是还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吗？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把自己摆在怎样的一个位置上去了呢？从这个“特殊论”出发，他们还否定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否定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似乎突然不灵了，他们要摆脱马克思主义而走自己的“特殊”道路了。试问，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除了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道路吗？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事物的特点，重视矛盾的特殊性，但同时也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论》）科学、文艺、教育和卫生等战线，情况各有特点，但它们都有着党的基本路线所概括的共同本质，即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对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同样应当起指导作用。毛主席指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科学技术特殊论”就是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理论。其实这些高喊“特殊”的修正主义者，自己对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特殊矛盾，是从来也不进行研究的，他们连自然科学发展同生产发展的关系这样一个重要的特殊问题也完全不懂，总是同客观规律相抵触，还说得上什么研究“特殊矛盾”呢？这只是骗人用的。他们叫喊“特殊领域”，不过是要维护这里的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而已。

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要保证科学技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必须在科技工作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即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用无产阶级的意志改造这里的一切。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科技人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然而《提纲》不这么看。它从阶级斗争熄灭论出发，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它给政治工作加上了“反对钻研业务”



等种种罪名，说什么“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使科技人员不敢钻研技术、不敢学外文、不敢看业务书，那就是失败的政治工作”。它甚至重新搬出邓小平过去诬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所用的恶毒语言，把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诬蔑为“苛捐杂税”，扬言要把它“砍掉”。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忽视政治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做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就会犯绝大的错误。反对这种倾向，才是真正从政治上关心科技人员的成长与进步。但是，无产阶级从来没有象《提纲》所诬蔑的那样“反对钻研业务”。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我们从来就是鼓励科技人员努力提高业务水平的。所谓“反对钻研业务”的神话，完全是《提纲》炮制者制造出来的。其目的是以发展业务为借口，反掉无产阶级政治这个统帅，而让资产阶级的政治统帅科学技术。表面上，邓小平是用业务挂帅代替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质上，他是要在科学技术界强行推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不但对于无产阶级政治深恶痛绝，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的“钻研业务”也是拼命反对的。他对于工农兵参加科学研究，开门办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科学技术发展道路是那样仇恨，对于劳动人民的智慧是那样鄙视，对于外国资产阶级手中的科学技术是那样迷信，即可说明其本质。邓小平这条路线只能把科研和科技人员引进一条死胡同，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科技界很少有人提出“不敢钻研技术”的问题。为什么？那时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下，为个人名利而埋头业务是“合法”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白专道路，不少人认识到了埋头业务的危险，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思想上没有转过弯来的科技人员，就再不能那么自由地一如既往了。这里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部分人也开始认识到过去的道路是不正确的，但还没有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弄清楚无产阶级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还没有真正树立为革命而钻研业务的思想。对这部分人来说，如果采用邓小平那种取消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办法来促使他们重新埋头于业务，那岂不是引导他们走回头路吗？另外一种人则是仍然坚持业务就是个人名利和资本的资产阶级思想，当他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欲望不能满足时，就不肯钻研业务了。对这些人来说，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



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才能逐步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他们逐步树立为革命而钻研业务的观点。但是，《提纲》的做法恰恰与此相反。它所提倡的正是邓小平竭力鼓吹的“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的修正主义道路，也即毒害广大科技人员的资本主义道路。

反对抓阶级斗争，鼓吹业务挂帅、白专道路，当然就要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纲》正是如此。它列举了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所谓“矛盾”，诸如“低级趣味与低级趣味”、“鸡毛蒜皮与鸡毛蒜皮”的矛盾等等，唯独没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矛盾。这种状况，还用得着提倡思想改造吗？你要提倡，它便攻击你是“以改造者自居”，是“离开使用谈改造”，是“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他们就是利用这种伪造现状加扣帽子的办法，从根本上反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什么叫“以改造者自居”？共产党人不就是要改造世界并改造自己吗！毛主席早就说过：“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难道知识分子就不用改造了？事实上，建国以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在改造思想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们从旧社会承袭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例如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轻视劳动实践、不愿与工农划等号以及知识私有、学术垄断、等级观念、名利思想等等，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完全克服掉的。对学术思想上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更是长期的斗争。在现实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们还会遇到各种考验，他们的思想还会有反复。在这种情况下，鼓励他们继续前进、不要倒退，不是完全应该、非常必要的吗？《提纲》炮制者反对“以改造者自居”，恰恰表明他们是以反改造者自居。反对改造，这是一切复辟派、倒退派的特征。这充分暴露出他们是一批以资本主义复辟派自居、反对历史前进、也反对知识分子向前进步的修正主义者。邓小平就是一个“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的走资派，他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这是毫不奇怪的。

邓小平反对“以改造者自居”，目的是想打起“关心”知识分子，为他们“请命”的旗号，借以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不仅如此，《提纲》炮制者们还公然利用



“功名利禄”拉拢、腐蚀知识分子，并且毫不掩饰地说，这样做是为了“使人感到有奔头”。用心固然狠毒，然而却是徒劳的。毛主席指出：“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多年来的实践中体会到，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朝前走，他们逐步失去的是资产阶级的精神枷锁，而逐步得到的则是工农的思想感情。要做到首先在阶级斗争中立场坚定，从而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不断做出应有的贡献，不坚持思想改造是不行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而不断继续进步的人，才会充分感到心情舒畅，感到大有可为，大有奔头。真正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对邓小平那种阻挠他们上进、妄图把他们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的罪恶行径，是感到无比愤慨的。因此，邓小平炮制的《提纲》一出笼，立刻受到广大科技人员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提纲》的炮制过程，又一次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英明论断。建国以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阶级关系的变化，走资派就逐步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了。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章罗同盟的“政治设计院”曾经抛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即《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那是在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幕后支持下，由党外资产阶级右派提出来的。经过反右派斗争，这个“科学纲领”被粉碎了。由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声名狼藉，再由他们提出公开的资产阶级纲领来反对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号召力。《提纲》这类的修正主义纲领，只有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亲自出马，才能炮制出来。《提纲》与一九五七年的“科学纲领”如出一辙，说出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心里话。《提纲》的出笼，说明走资派手握大权，打着“关心”科学的幌子，自上而下地制订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对党对人民确实有更大的危害。我们要充分利用《提纲》这个反面教材，在深入进行科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更好地同走资派作斗争。



精神可以变成物质

——批判邓小平反对工人参加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谬论

大连红旗造船厂党委会

工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阻碍生产还是促进生产的发展？对这个问题，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吹了不少妖风。由他指使制订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就诬蔑这是“名目繁多的各种差事”，叫嚷要“一律撤销”。在邓小平看来，似乎工人就是做工，只能埋头生产，否则，就会阻碍生产的发展。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厂的工人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以工为主，兼学其他，一边生产，一边参加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我们在厂内建立了工人理论队伍，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展分科理论研究，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配合学习和批判，我们还成立了工人业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广大工人写文章、编书、画画、演戏；同时，还选派理论骨干到大学和出版社当兼职教师、业余编辑等等，在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中努力做了一些工作。可是，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工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造船吨位而言，现在一个造船厂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九个造船厂；就万吨轮的建造周期来说，现在造一条船只占文化大革命前的九分之一。生产计划连续提前完成，一九七五年提前一个季度，今年上半年全厂工业总产值和造船吨位又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这是什么原因呢？



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深刻地揭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法，说明了精神对物质、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广大工人群众努力学习它，掌握它，以主人翁的姿态战斗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阵地，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冲破了资产阶级的种种精神桎梏，必然迸发出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使生产以过去无法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正是我们厂不断取得革命和生产新胜利的根本原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造船工人怀着把祖国的造船工业搞上去的满腔热情，夜以继日地干，力没少出，汗没少流。可为什么造船工业总是翻不了身？这个问题，我们反复提出过，思考过。随着学习和批判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楚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不是工人不愿意造船，二不是工人没有能力造船，而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让工人造，束缚了工人的手脚，扼杀了工人的革命热情和智慧。刘少奇之流胡说什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时候，船的心脏——主机，不许我们生产。一九五九年，我们自己设计、建造五千四百马力柴油机，搞到一半又被砍掉了。这样，我们造了船壳，没有“心脏”，造船吨位总是上不去。广大工人气愤地说，这不是要我们永远跟在洋人后面吃“仰脖饭”吗？不是伸着脖子让帝、修、反卡吗？不是敞开大门，让帝、修、反来奴役我们吗？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教导，狠批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工人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自力更生，群策群力，决心自己造主机，改变造船工业的被动局面。路线正确了，人的精神面貌变了，带来了生产上的大好形势。八千二百马力柴油机造出来了，一万二千马力柴油机也诞生了，试航证明质量良好。我们决心继续革命，动手建造我国第一台一万八千马力超缸径柴油机。

正当这台主机的建造进入关键时刻，邓小平刮起了右倾翻案风。他提出了一



个所谓“大政策”，说什么“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能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要同外国“订长期合同”，由外国资本家供应“最新最好的设备”。按他这么说，中国工人阶级不如外国资本家，中国工业的发展只好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恩赐了！在这股妖风的煽动下，反对我们自己造主机的人又活动开了，他们捏造了“罪名”上告。是继续造，还是半截停掉？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邓小平的这一“大政策”进行批判。邓小平的这个所谓“大政策”，跟刘少奇的崇洋媚外政策是一路货，是地地道道的卖国主义政策。发展工业想靠外国，靠得住吗？苏修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领教过，超级大国用经济“援助”之名，对弱小国家进行控制的现实我们看见过。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工业上不能独立，不仅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巩固。邓小平推行这个“大政策”，就是妄图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使我国变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批判邓小平，使我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更深刻了，自力更生的精神被广大工人群众所掌握，化作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凯歌声中，第一台一万八千马力超缸径柴油机又胜利造成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胜利，是精神变物质的又一例证。

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是束缚广大工人群众手脚的一副精神枷锁，“条条专政”则是另一副精神枷锁，它同样束缚着企业的积极性，束缚着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条条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流毒还没有肃清，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又大肆推行“条条专政”。“条条专政”一不靠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领导，二不顾革命群众的愿望、要求，只是由少数人发号施令，垄断着社会主义的企业。“条条专政”实际上是经济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群众对“条条专政”是深恶痛绝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曾经多次造了“条条专政”的反。一九七三年，我们厂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厂党委发动全厂职工反复酝酿和讨论，根据造船工业发展的需要和本厂的实际可能，提出了一个比上级提出的指标多造一艘一万五千吨油轮的增产计划。但就是得不到批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么大，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看不见？明明企业



有增产的潜力，为什么有的人却总说“底子薄”？为什么总是有人千方百计地要阻止企业和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斗争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绝不是单纯的业务问题，其中表现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领导权到底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掌握着领导大权，对于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愿望和要求，不但不支持，反而压制扼杀，这不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吗？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吗？因此，对“条条专政”，非同它斗争不可。上边不批计划，我们就自己干；上边不拨原材料，我们就清仓挖潜；上边不给配套，我们就到兄弟单位求援。这样，终于冲破“条条专政”的重重障碍，实现了增产计划，并大大突破了建厂设计纲要，同时，也为以后大幅度跃进积累了经验。

几年来，我们就是这样造了“条条专政”的反，坚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努力“办更多的事”。为了加快造船工业的步伐，我们不顾少数人的刁难、压制，自筹劳力，自己解决技术力量，建起了可造十万吨船舶的船台；为了打破推进器供不应求的被动局面，我们不理睬有的人的多次干扰、阻拦，试验成功具有先进水平的低压浇铸大型推进器新工艺，实现了推进器自给有余；为了适应渔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我们不怕在自己身上加担子，在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的同时，造出了灯光围网捕鱼船等新产品。批判了“条条专政”，近几年来，我们厂的造船吨位逐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完成国家计划的时间逐年提前，从提前十三天、三十天到一九七五年提前一个季度。这些都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妄图把经济大权集中到以他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手里，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复辟资本主义，广大群众是绝不答应的。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在实践中注意调整干部和工人的关系，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是实现精神变物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指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在社会主义的企业里，干部和工人本应是平等的关系，同志的关系。但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这种关系往往处理得不好。如文化大革命前，就是技术“权威”立法，管理干部执法，工人只许守法，实际上是把



工人当雇佣劳动力，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广大干部和工人一道联系实际，批判了“一长制”、“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批判了人与人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并对现行的生产管理体制进行了研究。现行的这种生产管理结构，实际上还是少数人管理企业，还严重地存在着人与人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痕迹”，正在日益变成束缚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桎梏，对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不加限制而任其扩大，就有可能使企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我厂电工车间原来有四十四名管理干部，分为生产、检验、技术三个组。长期以来，分工过细，互相扯皮；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干群关系紧张，影响生产效率。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全车间工人群众和革命干部充分讨论，采取措施，撤销了三个职能组，成立了由九名干部和四名定期轮换的工人组成的生产服务组。其他干部下放班组，边参加劳动，边做本职工作，使干群关系大改善，群众的革命精神大为振奋，车间的面貌迅速改观。我们总结推广了电工车间的经验，在厂里逐步建立、健全了政治宣传、生产计划、技术教育、产品质量等十个群众管理网，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直接管理企业；领导干部打掉官气，坚持参加劳动；技术管理人员克服脱离实际的旧习气，深入基层。全厂出现了团结战斗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比如，按过去的造船工艺流程，船体车间先造好船壳，其他车间再依次往船壳里安装设备。现在，船体车间的工人把麻烦留给自己，在船壳建造过程中就让兄弟单位的工人前来交叉作业，大家紧张地战斗在一起，发扬共产主义协作风格，使造船周期大幅度缩短。又如，过去许多车间的劳动组织按工种划分，过分强调分工，常常造成窝工。现在，工人们自觉地打破了旧的分工界限，搞一专多能，形成多工种“一条龙”，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工人之间，体力强的照顾体力弱的，技术高的帮助技术差的；集体作业时，大家争着干重活、脏活；分散作业时，力争快点完成自己的任务，以便腾出时间支援别人。人心齐，泰山移。领导与群众精神面貌的改变，相互关系的改善，使我厂的革命和生产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大好形势。

精神面貌的改变，带来生产面貌的改变，在技术改革上也深刻地反映出来了。我们厂是个建厂七十八年的老厂，设备比较陈旧、厂房比较简陋。党内走资派都是不相信群众的，长期以来，他们只依靠几个所谓的技术“权威”，工人群众的



聪明才智被埋没着，技术革新运动开展不起来，生产过程中还沿用许多落后的工艺技术。文化大革命使工人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大家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唯心史观，坚持实践，大胆创新，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广大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得到充分发挥，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技术改革不断攀登新的高峰。船体车间大炉班承担船体外板和肋骨的加工任务。过去，弯一张钢板要下炉烧红十几次，七、八个人抡锤敲打三、四个小时，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他们以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为指导，利用水与火之间的矛盾和钢板热胀冷缩的特点，变“水火不相容”为“火长水势，水助火威”，试验成功合金钢板“水火弯”的新工艺，从而改变了生产落后的面貌，全班由七十多人减少到三十多人，生产效率却比原来提高了三、四倍。锅炉车间的工人研究成功用炸药爆炸产生的力量代替冲压机的有模爆炸加工，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继续摸索，反复实践，逐步加强了对爆炸成型内在规律的认识，搞成了具有先进水平的无模爆炸成型新技术，等等。实践证明：在生产斗争中，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的程度，决定着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的程度；而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又要看学习革命理论的程度。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就是经过无数事实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普遍规律。邓小平自己“**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又反对我们工人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人向上层建筑进军，充分暴露了他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的丑恶嘴脸。邓小平否定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指导，攻击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其目的是要用修正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用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代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的卑劣用心，只能从反面激励我们以更大的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坚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日益为更多的群众所掌握，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革命和生产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本

方 海

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拥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篡改、阉割它的革命灵魂，是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惯用伎俩。邓小平一类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篡改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批示，就是一个标本。

一九六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批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明确地提出党内存在着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们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毛主席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指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这个批示和毛主席在这以后提出的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指示，是对马克思、列宁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它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成为我们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毛主席的整个批示来看，**管理也是社教**，是说管理也是阶级斗争。管理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毛主席的批示是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这场运动就是无产阶级对正在向我们进攻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开展的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一伙包括邓小平反对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竭力歪曲这场运动的阶级性质，保护党内资产阶级。毛主席这一批示，正是针对着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这里所说的社教是指阶级斗争特别是同走资派斗争，这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长期以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对抗毛主席的批示。他们竭力掩盖毛主席批示的主要内容，千方百计地阉割它的革命灵魂。他们根本不讲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不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而是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甚至反其意而用之，抹杀管理也是社教的阶级内容，把毛主席的批示歪曲成为单纯加强管理。怎样加强管理呢？还是搞修正主义那一套，无非是立几条“王法”，让走资派对工人阶级实行“管、卡、压”。这完全是和毛主席的批示背道而驰的。

在阶级社会中，企业管理总是有阶级性的。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关键是把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把社会主义企业办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企业管理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充分表明，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新型的人们相互关系就能得到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对于企业的领导权就能不断得到巩固。如果什么地方错误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人们相互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强化和扩大，企业领导人就会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样的企业也就要改变颜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批示，是因为这个批示，揭露了他们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本质。邓小平不是猖狂地叫嚣“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吗？不是攻击我们批判“管、卡、压”是扣“大帽子”吗？其实质就是想继续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剥夺工人群众对企业的管理权，用修正主义的规章制度，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或者用奖金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腐蚀人们的思想，使工人群众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

毛主席在这个批示里还指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把毛主席这个重要批示歪曲为单纯学技术。在他主持炮制的那个《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二十条》里，竟把毛主席这段批示的上半段统统删去，只留下“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在这里，三同不见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不见了，又回到单纯管理上去。管理又只讲学技术，不当外行。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管理人员和工人群众都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他们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还分等级，有的人就可能把他们掌握的那部分权力变



成特权，从人民的勤务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提出干部和管理人员与工人群众搞三同，学一门至几门手艺，正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证我们的企业不改变颜色。管理人员也只有把自己摆在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地位，和群众划等号，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思想感情上和工人打成一片，虚心向群众学习，做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才能把工作做好。如果不是这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欺压和剥削工人，那就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最后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干部和管理人员要不要学技术？当然要。毛主席一贯强调要使我们的干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但是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政治是统帅。干部只有坚持政治挂帅，和群众搞三同，学了手艺才能为人民服务。不讲政治挂帅，不讲三同，只讲学技术，这就抛弃了这一批示的主要精神。其实，邓小平也并不真的是关心干部学技术。他的真正目的是反对干部与工人划等号，反对干部与工人搞三同，保护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剥削和压迫工人。同时，欺骗我们的干部，放弃无产阶级政治，走“白专”道路，培养一批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培植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基础。

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歪曲毛主席重要批示，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倒行逆施的虚弱本质。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指出了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触到了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的痛处。他们对毛主席的批示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无比强大的威力，他们只好采用修正主义的手法，阉割它的革命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4页）但是，篡改岂能掩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在光芒四射的毛主席的重要批示面前，再一次暴露了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的修正主义原形。在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邓小平不是大讲什么有人“把毛主席的观点割裂开来”吗？毛主席这一批示的全文发表，对照着邓小平精心炮制的那些《条例》、《提纲》中歪曲、割裂毛主席指示的大量修正主义的编排，以铁的事实证明：恶劣地“把毛主席的观点割裂开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者自己。



邓小平为什么替“老戏”招魂？

江 天

邓小平在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胡说什么“老戏演了这么多年，革命还不是成功了”。这种反动谬论，本来是当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唱过不止一遍的老调，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已遭到革命群众的痛斥。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连语言都不变，又重弹此调，替“老戏”招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难道不值得人们好好地想一想吗？

按照邓小平的这种荒谬逻辑，似乎反动文化和革命政治可以并行不悖，政治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却可以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却可以是封、资、修的。这就是托洛茨基所宣扬的二元论，即毛主席早就批判过的所谓“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邓小平去年又跳出来贩卖这种修正主义的谬论，其用心十分险恶，就是妄图把文艺与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横加割裂，抹杀无产阶级政治与封、资、修文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旧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对抗性，从而否定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的必要性。既然“老戏演了这么多年，革命还不是成功了”，那京剧革命岂非多此一举！由此可见，他为“老戏”招魂，就是要翻京剧革命的案，算文艺革命的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邓小平眷恋不已的那些“老戏”，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是极为有害的。因为它是属于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的旧文化，它与帝国主义文化结成了反动同盟，每天都在麻痹和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这是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必须不断加以清除的一堆文化毒品和文化垃圾。“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



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写的《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提出了必须把旧戏舞台上那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的战斗任务，就是要我们从根本上去革“老戏”的命。但是，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及其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头目们，不但对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置若罔闻，而且变本加厉，极力给“老戏”捧场叫好，使之愈演愈烈。正是由于有了党内资产阶级挂帅人物撑腰，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文艺舞台上，竟然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恣意横行的天下。

建国以来文艺战线的斗争历史表明，围绕着对待“老戏”的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曾经进行了多次剧烈的较量。这些斗争，又总是与党内政治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的。文艺界黑风迭起，其风源无不出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那里。一九五六年，刘少奇大放厥词说：“《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嘛，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一个新中国吗？”邓小平去年为“老戏”招魂的谰言，与刘少奇当年的这种谬论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照他们的说法，“老戏”岂止无害而已，甚至还有功劳，连新中国都是“老戏”唱出来的呢。有刘、邓这样的“大人物”在给“老戏”评功摆好，当时的文艺界便打开了所谓“开放剧目”的闸门，以至宣扬凶杀、色情的《杀子报》、《大劈棺》都破门而出，大演特演起来。这一阵“老戏”的锣鼓，鼓动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一九六二年前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又一次在“老戏”上大做文章，以种种名目，翻箱倒柜，把霉烂不堪的货色都拿出来毒害广大群众。即便是到了这般严重地步，邓小平还嫌不足，干脆指令要在文艺舞台上更加完整、系统地替帝王将相续家谱：“从三皇五帝编起，一直编到近代史”，“编它三百六十本，一天演一本，可演一年。”于是，披上了所谓“新编历史剧”外衣的一批反党大毒草，就在紧锣密鼓之中纷纷出笼。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对那些老腔老调有什么特殊的癖好，而是为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老戏”当作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刀枪剑戟，来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专无产阶级的政。

针对这种严重局面，毛主席尖锐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并且特别提到：“至于戏剧等



部门，问题就更大了。”在毛主席光辉批示指引下发动的京剧革命，既然是要革“老戏”的命，它的斗争锋芒，就必然要指向那些竭力为“老戏”辩护的党内走资派。京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同时也是这场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难怪党内走资派对它恨之入骨，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结下了不解之仇”。所以，当京剧革命刚刚兴起之日，他就大吹冷风说：“新戏好的不多，以后还会有老戏吧！戏剧改革我双手赞成，但我就是不爱听。”“双手赞成”是假话，“不爱听”倒是事实，而竭力反对才是他的本意。“以后还会有老戏”这句话，就透露了他要让“老戏”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的急迫心情。伏线早就埋下了，心中有本变天帐，因而当他一旦重新工作，大权在握，自以为能左右局面时，便迫不及待地要召唤“老戏”魂兮归来了。

但是，**翻案不得人心**。邓小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千呼万唤的“老戏”没有能够登场，自己倒确实是“第二次被打倒”了。从他这场颇有讽刺意味的表演中，人们又增加了一番见识。

它首先告诉我们，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文艺界复辟的主要危险，也是来自党内走资派。因为他们身披伪装，手中有权，党外资产阶级想讲而不敢讲、想干而不敢干的，他们敢讲、敢干，搞起复辟来，确实比党外的资产阶级更厉害。在革命样板戏已经广泛普及、深入人心，文艺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象“老戏演了这么多年，革命还不是成功了”这样的谬论，如果从党外的资产阶级嘴里说出来，这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了，可是由邓小平这样的人物嘴里说出来就不同，因为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斗争实践表明，走资派在党内刮什么风，社会上就会掀起什么浪。当邓小平为“老戏”招魂的时候，有些地方不就发生了大演那些又黑又坏的“老戏”的复辟事件吗？这说明存在于党内外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就是这样上下呼应、沆瀣一气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上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不能不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派的身上；只要有邓小平这样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充当挂帅人物，他们复辟的希望就很容易变成复辟的行动。

不难设想，“老戏”上台，必然是革命样板戏下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



鬼蛇神上台，必然是工农兵英雄人物下台。这样一来，不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付诸东流，毁于一旦，而且连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也将丧失殆尽，中国社会就要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时代去。所以，邓小平为“老戏”招魂的那种托洛茨基二元论，归根到底，无非是要从文艺到政治都统一于资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正如毛主席在批判资产阶级顽固派时曾经指出的：“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新民主主义论》）

邓小平为“老戏”招魂，不但暴露了党内走资派的反动性，同时也暴露了他们本质上的虚弱性。他们在文化方面，由于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来同无产阶级对抗，便只能乞求和借助于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在文化思想上则表现为复古思想和洋奴思想，颂古非今，崇洋非中，赞扬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毒素，拼凑成封、资、修三位一体的反动文化同盟，来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化较量。党内资产阶级的这种特点，是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较软弱无力这一历史特点的必然表现。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从刘少奇到邓小平这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要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为什么邓小平对“老戏”的辩护始终不变，对已经占领了文艺舞台的革命样板戏怀有那样的刻骨仇恨，这都是因为他们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便不能缺少“老戏”这样一个可以为之鸣锣开道的舆论工具。

对于邓小平大搞复辟倒退的行为，这里好有一比，他很象是一种“身首异处”的情形，躯体虽然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头脑却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如果说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无产阶级虽不同心，还能勉强同走一段路程的话，那么，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既不能同心也不能同路了。这是因为他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那种顽固派的特征，总是认为旧的好，而且越旧越好，于是便“横下一条心，拚老命”也要开倒车。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断言的那样：“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不管邓小平怎样起劲地为“老戏”招魂，那个“以后还会有老戏”的“以后”，仍然还是渺茫得很。而我国丰富多采的各个剧种，正沿着京剧革命所开辟的广阔道路前进，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呈现出百花盛开、春色满园的景象。让邓小平去向隅而泣吧！



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

永远坚持毛主席的建军路线

——批判邓小平在军队建设上的修正主义谬论

沈 屏

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了四十九年的光辉道路。四十多年来，我军始终把实现党的纲领、路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的光荣革命传统，同全国人民并肩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政治任务，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作用，成为粉碎党内外资产阶级复辟倒退的重要力量，抵御帝、修、反侵略颠覆的钢铁长城。我军所以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继续革命，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集中到一点，就是时刻遵循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加强部队建设。

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遵循党的政治路线，适应党的政治任务，加强军队建设，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军历次的整风运动，都是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在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在谈到军队建设的时候，指出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进行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为武器，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部



队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我军建设，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更大贡献。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从根本上歪曲了毛主席关于军队建设的指示。他从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的需要出发，在军队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抛出以“整顿”为纲的修正主义军事纲领，否定军队建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用“整顿”这根大棒，整掉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整掉我军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的任务，整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整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妄图按照走资派的面貌，把我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整”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以“整顿”为纲，非常鲜明地表达了邓小平那个“讲话”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倾向，是他“全面整顿”的翻案复辟行动部署的一个重要步骤。

军队工作究竟以什么为纲？这直接关系到我军的性质和建军方向，历来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早在建军初期，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着重批判了“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种错误观点，并指出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之一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一再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全党各项工作的纲，当然也就是军队工作的纲。军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党，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路线服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纲领、路线的武装集团。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军事工作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是从属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军要为执行党的基本纲领、实现党的最终目的而奋斗，就必须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军队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建设军队。这样，才能保



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使我军一切行动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步调一致地去夺取胜利。离开全党工作的纲,离开党的基本路线,发展下去,就会改变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就有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军队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军队中来。在我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同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反映经济基础方面存在着的“**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弊病,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在我军占主导地位,决定了我军与旧军队有本质的区别。但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摆脱了古田会议决议所指出的那些旧军队的影响。特别是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同走资派作斗争,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的战斗任务。邓小平要以“整顿”为纲,整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就是反对我们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这就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军队建设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提起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正确思想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军队不变质,使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里。

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军的形势,这不仅是对人民军队如何估价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在攻击各条战线是今不如昔的同时,也把我军描绘为漆黑一团,否定三支两军的巨大成就和部队建设的巨大进步。他诬蔑部队问题“相当多”,并把这些所谓问题统统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支左“形成的”。显而易见,邓小平否定我军的大好形势,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整顿”军队,是要在军队工作中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整顿”为纲,说穿了就是复辟为纲。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在这场殊死的阶级大搏斗中,我军响应毛主席关于“**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遵照毛主席的



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同全国人民团结战斗，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为人民立了新功。对此，党中央曾一再加以肯定，人民群众予以热情赞扬。而邓小平却横加指责，全盘否定。这也毫不足怪。因为他曾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理所当然的揭露和批判，他怎能对三支两军、对文化大革命不恨之入骨，耿耿于怀呢？

毛主席在光辉的《五·七指示》中，明确地规定了我军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和建军方针，重申我军除打仗以外，还要做各种工作，特别要参加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我军是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而产生、而存在的。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是我军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人民群众一起进行反修防修的一次重大实践。如果军队不参加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不成其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军队。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也是我军建设的强大推动力。文化大革命胜利开展的十年，是我军建设胜利前进的十年。在这场大革命中，我军通过走向社会，经风雨，见世面，受到了在平时受不到的锻炼，学到了在营房里学不到的东西，进一步懂得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增长了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本领。看书学习蔚然成风，新生事物大量涌现，新生力量茁壮成长，部队建设积累了新鲜经验。珍宝岛、西沙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显示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军更加强大。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当邓小平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和军事纲领一传到部队，许多干部、战士就嗅出味道不对，勇敢地进行了抵制和批判。一大批“小人物”敢于藐视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顶逆风，战恶浪，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先进事迹，生动地说明文化大革命意义非常深远，修正主义必遭失败。这些可喜的成果是我军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对形势的看法，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没有什么好和坏的同一标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它给各条战线带来的大好形势，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看来，是大好事，而对党内外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邓小平来说，岂止是坏，简直是一场灾难。路线决定形势，形势反映路线。形势大好，说明路线正确。邓小平所以要否定我军的大好形势，就是要否定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否定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继续推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我们军队制造舆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当前，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苏美两霸的争夺愈演愈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当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而国内的阶级斗争总是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国内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总是有国际背景的。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积极参加反复辟斗争的同时，要准备打仗。我们要认真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和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在准备打仗的问题上，邓小平也散布了不少修正主义谬论。他所谓的“关心”战备，是包藏着祸心的。他以“整顿”为纲，贩卖唯武器论和唯生产力论，竭力鼓吹打仗就是“打钢仗”，备战就是备“钢铁”，肆意颠倒人和物、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企图把战备工作纳入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轨道，既破坏革命，也破坏战备。

打仗主要靠什么？备战重点备什么？用什么路线指导战备？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毛主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论持久战》）在现代条件下，尽管武器装备有了很大发展，战争特点有了新的变化，对军事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却改变不了毛主席指出的这一为中外革命战争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主要不是靠“尖端”武器，而是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靠毛主席为我党、我军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我们从不否认打仗需要钢铁，从不否认改善武器装备，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技术的



必要。问题是要把位置摆正。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是我们处理战争准备中各项准备之间的关系的唯一正确方针。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是多方面的，都要认真做好，但主要的是精神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革命精神，要有敢打必胜的信心。做好精神准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能不断创造出赢得战争胜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充分发挥一切技术、战术的效力。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战备，战备就能备得好，打仗就能打得胜。而邓小平只讲武器的作用，不讲“**兵民是胜利之本**”（《论持久战》）；只讲钢铁的作用，不讲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只讲物质准备，不讲精神准备，一味鼓吹未来战争就是“打钢仗”，甚至要所有企业的工人民兵“一律撤销”。按照邓小平的反动逻辑，似乎战争的胜负、革命的成败、人类的命运，都是由钢铁、武器、技术决定的。那就等于说，当今世界上钢铁最多、武器最好的苏美两霸，可以永远为所欲为地主宰世界了；世界上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只好屈从于核霸王的奴役和控制，永远当牛做马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都统统不可能了。历史证明，一切机会主义者鼓吹唯武器论，必然导致投降主义，导致取消革命，葬送革命的胜利成果。邓小平鼓吹的唯武器论，也完全是失败之道，卖国投降之道，是直接为苏美两霸的战争讹诈和强权政治效劳的。他所贩卖的唯武器论，是他顽固坚持的唯生产力论在军事上的变种。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战备，只能是为他复辟资本主义做准备。

我军具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军深入人心。一切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玩弄的阴谋，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林彪搞政变，要打倒无产阶级，结果自己被打倒了。今天邓小平这个复辟狂，妄图用“整顿”来整无产阶级，也只不过是“**一枕黄粱再现**”。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要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联系实际，加强学习，深入批邓，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永远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胜利前进！



在三同中密切官兵关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济南第一团”党委会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批示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主席这个重要批示，深刻地揭露了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是我们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我军进一步搞好官兵关系、加强部队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官兵一致，是我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倡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个光荣传统。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本质，闪烁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是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任何敌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作战频繁、生活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在第一线指挥，在第一线战斗，与战士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铺，一壶水让着喝，几粒黄豆分着吃，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战士。在解放济南的战斗中，在淮海战役中，我们团就涌现出许多干部爱护战士、战士爱护干部的动人事迹。

我们团的领导成员大半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为革命立过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战争年代与战士三同的革命传统。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领导干部地位变了，薪水高了，生活条件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保持和发扬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平的环境，优裕的生活条件，容易滋长以功臣自居、贪图安逸、不求进步的情绪，容易欣赏和追求资产阶级法权，容易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往往利用这一点，用糖衣炮弹向我们进攻。我们当领导干部的如不高度警惕，认真改造世界观，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蚀和影响，官兵之间的阶级兄弟关系就会起变化，发展下去，就会同广大基层干部、战士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因此，坚持和战士三同，在战争年代固然重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和平环境中，就更显得重要。它不



是“小事一桩”，而是关系着永远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事。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经常回顾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教育大家不要把功劳当包袱，要继续革命立新功。对于从基层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我们也教育他们充分认识坚持三同的重要性，做到担负领导工作不脱离战士行列，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党委作出了决定，团的领导干部每年至少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到连队与战士搞三同。近几年来，团的主要领导干部每年每人平均下连当兵、代职和蹲点，与战士实行三同都在四个月左右。

领导干部与战士实行三同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然会遇到各种障碍和阻力。我们党委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从而把在三同中密切官兵关系的过程变成了改造世界观、加强党委思想建设的过程。

在三同中密切官兵关系，必须打掉官气，自觉与战士划等号。我军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只有革命的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分。但是，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是个官，到了连队，往往放不下架子；战士出于对领导的尊重和关心，给予某些照顾，也心安理得，无形中和战士之间有了距离，形成隔阂。这实际上还是“官贵民贱”的旧思想在作祟。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教导，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大家自觉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放下官架子，和战士划等号。在三同的过程中，党委成员注意处处以普通党员、普通劳动者、普通一兵的身分出现，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睡一样的床铺，和战士同学习、同批判，一起操课训练。一位副政委在三九寒天带连队外出执行施工任务，别人给他单独安排了一间有暖气的房子，他却与战士一起住工棚；吃饭时炊事班给他加了个菜，他把加的菜倒进大锅里；施工中，他重活累活抢着干，泥里水里下得去。战士们说：“副政委当官不象官，和我们一个样！”这个副政委也深有体会地说：“领导干部有架子，战士把你当客人，对你敬而远之；只有放下架子，与战士划等号，战士才能把你当成自家人，和你坐到一起，说到一块！”

在三同中密切官兵关系，还必须破除“领导高明”论，虚心拜群众为师，当好战士的学生。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在口头上也讲要向群众学习，但在实践中又总觉得自己的军龄比战士的年龄还长，打过的仗比战士搞过的训练还多，还是自己比战士高明。到了连队，常常以教育者自居，喜欢指手划脚，弄得连队干部、战士无所适从。事实证明，这种“领导高明”论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实行三同、密切官兵关系是非常有害的。毛主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毛主席又指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



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我们在实践中深深感到，战士们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革命理论学得比我们好，路线斗争觉悟比我们高，要求革命、要求进步比我们强烈，掌握的实际知识、新鲜经验比我们丰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战士走在干部前面，首先对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提出了批判。在军事训练中，战士们提出许多领导干部不曾想到的切实有效的办法。这些事例对干部思想触动很大，提高了向战士学习的自觉性。许多同志在三同中还注意向战士学一些“手艺”。一位副团长负责训练全团汽车驾驶员，他一点一滴地向驾驶员和车辆管理人员请教，摸到了汽车管理的规律，取得了领导的主动权。实践使大家体会到：职务高不等于觉悟高，资历长不等于能力强。领导干部只有老老实实拜群众为师，恭恭敬敬向战士学习，不断从群众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才能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不断前进。

在三同中密切官兵关系，关键在于增强对战士的无产阶级感情。如果对战士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人虽然下到连队，心却和战士隔着一堵墙，缺乏共同语言，那就不可能真正密切官兵关系。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应当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关心战士，爱护战士，帮助战士。对战士有了这种阶级感情，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够做深做细，管理才能搞好。团政委在八连蹲点两个月期间，先后找了全连半数以上的干部战士逐个交谈思想情况，帮他们解决思想问题。有个战士为入党问题背上了思想包袱，政委多次找他谈心，和他一起学习，帮助他提高了觉悟。二连一个战士的父亲得了重病，在这个连代职的副政委亲自到城里买了药，寄给了这个战士的父亲，战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们干部对战士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战士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贴心人”、“知心人”，有话愿意找我们说，有事愿意找我们商量，有困难愿意找我们帮助，有意见也敢于向我们提，对于我们布置的工作任务，执行起来也就更自觉、更坚决。

在毛主席建军路线指引下，多年以来，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党委通过狠抓领导干部和战士搞好三同，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部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圆满地完成了训练施工等各项任务，呈现出一派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这是对邓小平攻击部队形势，污蔑部队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等无耻谰言的有力批驳，也是对他反对三同，破坏官兵关系的有力回击。我们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深入批判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长期坚持和战士搞三同，更好地发扬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为促进部队建设，加强战备，解放祖国神圣领土台湾，胜利完成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



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好战备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红一连党支部



我们连队驻守在祖国东北反修前哨，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的光荣任务。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连队荣立了集体一等功。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开展以来，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各项战备工作也做得更好。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阶级斗争是各条战线、各项工作的纲，也是我军战备工作的纲。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和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形势，认清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规律，使干部、战士牢记我军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的根本职能，才能更自觉地做好战备工作，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在战备教育中，我们带领全连同志深入批判邓小平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注意观察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风云变幻，使大家不断克服和平麻痹思想，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不忘战备。连队“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经常给全连宣讲国际形势，揭露苏美两霸假缓和真备战、加紧争夺世界霸权、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罪恶行径。我们还用苏修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种种铁证，愤怒控诉苏修新沙皇的罪行，使同志们更加看清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认识到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就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我军不仅担负着对外反侵略的职责，而且担负着对内反复辟的历史重任。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党内走资派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



量。为了认清党内资产阶级的特征及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性，我们组织全连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及其翻案复辟的罪行。全连共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八十九次，写出批判文章一千八百五十多篇。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发生以后，我们连夜组织全连同志进行声讨和批判。同志们说：林彪在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迫不及待地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邓小平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破了产，一小撮阶级敌人立即跳出来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既要揭露党内资产阶级的政治阴谋，彻底批判他们的反动谬论，又要时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和镇压他们的反革命暴乱，充分发挥我军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强大威力。同志们还联系文化大革命以来，每当我国人民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总是进行破坏和捣乱的事实，认识到党内资产阶级是帝、修、反在国内的代理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是党内资产阶级的靠山，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遥相呼应、狼狈为奸。因此，我们要把同国内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和防备外患联系起来，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更要警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活动。

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特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反复辟要长期作战，反侵略要常备不懈。由于脑子里有了敌情观念，眼睛里看准了主要敌人，战备工作就得到进一步落实。党支部加强了对战备工作的领导，重新修订了战备工作计划。连队健全了战备检查制度，定期检查战备落实情况。全连同志团结战斗，日日夜夜守卫着社会主义祖国的北部边疆。

备战主要备什么？打仗主要靠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直存在着原则分歧。我们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包括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都应该认真搞好，但是主要的是精神准备。邓小平从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和唯武器论出发，胡说什么打仗就是“打钢仗”，备战就是备“钢铁”，一味强调物质准备，闭口不谈精神准备，不谈人的因素，不谈人民战争，妄图从根本上破坏我军的战备工作。我们批判了他的这一套谬论，在战备工作中，始终把精神准备放在首位，坚持以精神准备带动和做好各项物质准备。



为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精神准备，我们着重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教育干部、战士以阶级斗争为纲，牢固树立准备打仗的思想。只有在思想上时刻准备打仗，才能在行动上自觉落实各项战备工作。我们从思想教育入手，引导大家自觉破除各种妨碍战备的思想障碍，并注意抓住形势变化、任务转换、人员变动等容易引起思想波动的各种时机，有的放矢地进行战备教育，使全连同志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不管风云怎样变幻，任务怎么转换，人员怎么变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狠抓战备思想不放松。

二是培养干部、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只有平时培养这种革命精神，战时才能攻如猛虎，守如泰山，敢打必胜。在这方面我们有切身体会。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我们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粉碎了苏修侵略军的武装进攻，胜利地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涌现了以战斗英雄、副连长王庆容为代表的七十多名战斗功臣。我们注意经常不断地对部队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今年三月，我们组织全连战士重新参观了连队“荣誉室”，请老连长回连讲传统，认真学习这些同志的英雄事迹，继承和发扬珍宝岛战斗的革命精神。好钢要在烈火中冶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要在实践中磨练。在战备工作中，我们注意锤炼干部、战士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例如，去冬今春的野营拉练，全连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全副武装长途跋涉，常常是大路不走走小道，平地不走走山川，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还练习向敌冲击，抢占山头，刻苦磨练战时所需要的顽强战斗意志。

三是引导干部、战士增强人民战争的观念。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从思想上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论持久战》），这是做好反侵略战争精神准备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加深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解，我们回顾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当地人民群众男女老少齐动员，民兵踊跃参战、妇女护理伤员、儿童站岗放哨、老人烧水做饭的动人情景，狠批了邓小平迷信武器、钢铁，否定人民战争的反动谬论。在今年的战备工作中，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和人民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训练。多次派出连队骨干，到学校积极帮助师生搞军训。对来连队学军的民兵，我们热情接待，大力支持。还把连队拉到农村搞驻训，帮助贫下中农学军事。仅今年上半年，我们就为工厂、农村、学校等五个单位培训民兵七百二十多人。



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积极搞好军事训练，这也是搞好战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证明，有了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干部战士的头脑中，再加上过硬的杀敌本领，就如猛虎添翼，就能战无不胜，更好地发挥我军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

军事训练工作历来存在着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的尖锐斗争。邓小平继承彭德怀、林彪的衣钵，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公然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否定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训练方针、原则和传统练兵方法，妄图把我们军队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未来反侵略战争同过去的历次革命战争相比，是有某些不同，比如作战对象变了，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发展了，等等。但是，无论客观情况怎么变化，武器装备怎么发展，我们要赢得战争胜利，还是要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革命战争的科学总结，是指导革命战争的普遍真理。我们要搞好战备训练，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坚决照着办；狠批邓小平的反动谬论，同他对着干！

在训练中，我们组织干部、战士结合训练实际，结合典型战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成立了有十五名干部、战士参加的“军事思想研究小组”。这个小组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研究了现代战争的作战特点，根据连队军事训练的实际需要，编写了三份训练教材，对于搞好战备训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全连同志按照毛主席倡导的“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训练方法，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掀起群众练兵热潮。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出发，加强了以打坦克、打飞机为重点的近战、夜战训练。祖国东北边疆处在高寒地区，为了使连队适应高寒地区作战特点，提高作战能力，干部、战士在冰天雪地练习潜伏、出击等本领。为了使连队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各种条件，我们不仅苦练陆上作战本领，而且，全连同志苦练游泳技术，提高水上作战能力。事实证明，只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按照毛主席军事思想搞好战备训练，战备工作就能做得好上加好，部队战斗力就会得到迅速提高。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全连同志决心不骄不躁，乘胜前进，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进一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解放祖国领土台湾贡献力量。



加强工人民兵的建设

上海沪东造船厂党委会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厂广大民兵深入揭露和批判了邓小平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决心把工人民兵组织建设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更好地担负起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的光荣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厂的民兵组织进行了重建，目前有民兵七千多人，其中基干民兵三千多人。近几年来，这支工人民兵队伍积极参加社会上和本厂的阶级斗争，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前民兵脱离现实阶级斗争的状况。但是，围绕着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民兵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胡说什么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不正规”，叫嚷要所有企业的工人民兵“一律撤销”，充分暴露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对工人民兵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工人民兵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民兵工作的破坏和干扰，使我们增强了组织工人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自觉性。这几年来，我们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工人民兵参加到社会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全厂的民兵都参加社会上的重大政治活动，并实行厂、区挂钩，对挂钩的两个里弄派出了工人民兵小分队。同时，还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组织了七千多人次的民兵外出值勤，或者利用业余时间轮流到挂钩地区与民兵小分队协同作战。工人民兵深入街道里弄，狠狠打击了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级敌人，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青少年，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我们厂的工人民兵同街道里弄干部、公安战



士、退休工人和革命家长一起，先后举办了两百多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和政治夜校，协助街道里弄开展“向阳院”活动，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争夺青少年的激烈斗争。有一些受资产阶级腐蚀犯错误的青少年，经过工人民兵的耐心教育，主动揭露了幕后教唆犯，改正了错误，进步很快。群众高兴地说：“党的阳光照千家，里弄盛开向阳花，民兵浇水又施肥，捉虫除草育新芽。”

列宁曾经说过：“**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69页）工人民兵应当是无产阶级军队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之一。工人民兵是干什么的？是搞阶级斗争的。广大民兵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不仅和人民解放军一起担负着保卫国防，建设国防，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而且要同党内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民兵组织的性质和任务规定了民兵要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斗争本领，而阶级斗争观念的增强和阶级斗争本领的提高，一定要通过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才能达到。我们厂的广大民兵正是在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掌握了社会上阶级敌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懂得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总是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相呼应的，从而不断提高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自觉性。有了自觉的认识，才能表现为自觉的行动。积极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有力地促进了民兵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促进了民兵工作的“三落实”。

工厂的阶级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为了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工厂，工人民兵也一定要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阶级斗争。几年来，我们在积极组织工人民兵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同时，也注意了在本厂的阶级斗争中发挥工人民兵的战斗作用，并在这方面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形成了一些比较健全的制度，保证了民兵活动的经常化。如：每周开一次敌情分析会，组织民兵分析全厂和自己所在车间、班组的阶级斗争动向，做到“敌情我明，敌动我知”；采取“哪里发生案情，就交给那里的民兵去破案”的办法，及时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改变了过去少数人神秘办案的状况；重点要害部门的保卫工作依靠民兵落实，定人、定时、定点抓好厂内公共场所的治安防范；以民兵为骨干成立监管小组，对厂内的四类分子加强监督改造，充分发



挥了群众专政的威力。分布在全厂各个岗位上的七千多民兵，都来抓阶级斗争，做到了“处处岗哨处处兵”。我们不仅组织工人民兵抓“有形”的阶级斗争，而且发动工人民兵注意抓“无形”的即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带头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样做，既加强了厂内的治安保卫工作，又巩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阵地，有利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文化大革命中重建的工人民兵，是一支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建设起来的工人武装。它的出现和壮大，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党内走资派以及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竭力攻击工人民兵，是并不奇怪的。林彪反党集团曾经恶毒攻击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别出心裁”，搞“专政的多中心”；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又阴谋篡改民兵建设的正确方向，妄图砍掉工人民兵。林彪、邓小平之流越是仇视和反对工人民兵，我们就越是要在斗争中加强工人民兵建设。在邓小平竭力攻击工人民兵的时候，我们组织民兵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有关教导，从而坚定了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建设民兵的正确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大联合得到巩固的基础上形成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人民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已经在阶级斗争中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厂的广大民兵通过学习革命导师的教导和回顾民兵工作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及时识破了邓小平破坏民兵建设的罪恶阴谋。大家同邓小平对着干，更加自觉地参加社会上和工厂的阶级斗争，以实际行动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在斗争中搞好民兵建设，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加强党对民兵工作的一元化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战争和战略问题》）党管武装，是毛主席制定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则，是我党我军的革命传统。工人民兵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武装，也一定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加强党对民兵工作的一元化领导，是各级党委的一件大事。我们厂党委把民兵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民兵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不断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



党对民兵工作的一元化领导，最重要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民兵干部和战士，是做好民兵工作的根本保证。我们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批林批孔，学理论，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组织全厂民兵重点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提高广大民兵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为了保证民兵的学习，我们厂在每周一次的“民兵活动日”，结合民兵建设的实际和民兵工作的特点，选学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民兵工作的破坏和干扰，认真加强了民兵的思想建设。加强党对民兵工作的一元化领导，还必须有相应的组织形式。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民兵组织也是这样。几年来，我们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逐步发展和完善了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的组织体制。厂党委有一名副书记主管民兵工作，党委设立武装保卫组，负责抓全厂的民兵、治保、消防工作。各车间、部门由总支书记兼任民兵的教导员和指导员，做到领导上有人抓，组织上有措施，工作上有要求，时间上有保证。

民兵队伍的自身革命化，是关系到民兵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的重要问题，一定要切实抓好。党委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决不能满足于“听听汇报，订订措施，排排时间”，而应当着重抓好对民兵干部和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有阶级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民兵组织中来，要努力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对民兵队伍的侵蚀。我们经常注意对广大民兵进行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和战备教育，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思想和作风，同时还特别注意在斗争中训练民兵干部，培养先进典型。几年来，全厂已有二百四十多名民兵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二百多名民兵被群众推选到各级领导岗位。

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在活动，走资派还在走，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加强工人民兵队伍的建设。我们决心向解放军学习，向首都工人民兵学习，把工人民兵建设成为一支能文能武的战斗队伍，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国际国内的阶级敌人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科 学 史 研 究

对生命认识的两种世界观斗争

胡 雨 涛

今天地球上的生物世界，瑰丽多彩，不断发展。但在三十多亿年前，我们这个星球却杳无生命的踪迹。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产生的？怎样认识生命的“奥秘”？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利用他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生命观，来为他们的反动政治服务。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则努力揭示生命的物质性，从而论证物质运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宣传事物的辩证法。今天，回顾生命观上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对于我们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驳斥邓小平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谬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指导科学研究，加强科技领域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将是有益的。

古代生命观上的两军对战

生命，是与死亡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矛盾论》）在原始社会，人们从死亡了的亲人、同伴和飞禽走兽身上，看到了生物和死物的区别：人活着时有能动地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动物活着时有主动地适应自然界的能力；这种能力都在死亡后消失了。他们就把生物区别于死物的这种特殊性，看做生命。这种特殊性的原因是什么？原始人是不了解的。他们受梦境中景象的影响，产生了灵魂的观念，认为物质躯体之外，还有一个超物质的灵魂存在，死亡是灵魂与躯体的分离，而生命则是灵魂和躯体的结合，物质的躯体不能



不死，超物质的灵魂则能永生。原始人这种灵魂观念，是当时生产力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低下的反映。

随着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发展，人们逐渐从生命与物质的对立中看到了它们之间的统一性。鱼儿离不开水，庄稼离不开土壤，人和一切生物都离不开空气、雨露、阳光。显然，生命的存在有赖于非生命物质的滋养。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生命的产生也是同非生命物质分不开的。腐草为萤，鱼枯生蠹，就是古代人关于生物可以从死物转化产生的直观认识。鱼“水精自为之”，草“地气自出之”，（王充：《论衡·讲端篇》）则是古代人关于生命可以从水、土等非生命物质直接产生的一种猜测。这些见解，虽不能认识生物发生和发展的真正原因，但它不承认“灵魂说”，主张生命可以由物质“自然发生”，闪耀着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光辉。

但在阶级社会中，反动统治者们出于愚弄人民的需要，却极力扼杀生命观上的唯物论，而唯心论的生命观则在灵魂观念的基础上得到了提倡和发展。在我国古代，代表反动没落阶级的儒家就大肆鼓吹“天命论”，胡说什么人是“受命于天”，天是“万物之祖”，要劳动人民尊天命、敬鬼神，不许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当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曾经同这种反动谬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如汉代唯物论者王充就明确指出：“天不能故生人”，（《论衡·物势篇》）“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篇》）认为人和一切生物根本不是由老天特意创造，而是物质性“元气”相互作用的结果。明代的罗钦顺也认为“万物之生长收藏”，都因气的“一动一静，一往一来”所致，“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根本与“天理”之类无关。（《困知记》）这种朴素唯物论的生命观，揭穿了儒家说教的欺骗性，对于发扬“人定胜天”思想，鼓舞人民斗争意志，起了积极作用。

朴素唯物论者坚持了生命与物质的统一性；但对于这种统一的条件，他们当时还毫不了解。“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矛盾论》）因此，在统治阶级的宣扬下，“天命论”、“灵魂说”等生命观上的唯心论还是大大发展了起来，后来它又同宗教迷信结合，宣扬灵魂转生、因果报应之类，长期毒害人民。古希腊后期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目的论，认为生命是物质的产物，但又认为物质只有依靠某种超物质的“内在目的性”（或“隐得来希”）的作用，才能转化成为生命。他企图这样来“统一”生命同物质之间的对立，实际上还是助长了“灵魂说”。在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统治者们把这种目的论生命观同宗教神学结合起来，



宣扬灵魂不灭，生命神创等反动说教，对敢于从科学上揭示生命现象的一切尝试，进行了残酷的打击。

这是古代生命观上一场激烈的两军对战。它告诉我们，自从有了阶级，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因此自然观包括生命观在内，就必然打上阶级烙印，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自然观从来是不存在的。

从机械论的生命观走向“活力论”

欧洲中世纪末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推翻封建统治，需要从灵魂、上帝等束缚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精神绳索中挣脱出来。他们大力宣扬生命的物质性，对神学生命观进行了猛烈的冲击。

十七、十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机械制造业、冶金业等的兴起，力学首先在当时的自然科学中跃居了主导地位。同时解剖学也发展了起来。人们从力学和解剖学中，发现人和动物的躯体同一架机器差不多，支配它的每一个动作的，是心脏、血管、骨骼等器官“部件”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力。根据这种认识，笛卡儿在十七世纪第一个提出了“动物是机器”的论断。接着，法国医生拉美特利又在十八世纪进一步提出“人也不过是一架直立行走的机器”，而所谓灵魂，不过是这种“生命机器”的功能活动罢了；离开了“生命机器”的物质结构，也就无所谓灵魂。这种关于生命运动的力学解释是唯物的。我国古代“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范缜：《神灭论》）的无神论思想，此时就得到了力学和解剖学的论证。新兴资产阶级拿起力学的解剖刀去剔除动物和人类生命领域里的超物质的灵魂，神学生命观的庄严殿堂就被捅得百孔千疮。但它把人体看作机器的机械唯物论的生命观，却是形而上学的。这种形而上学对医学和生物学的消极影响很深，一直延续到现在。

生命运动确实包含了力学运动。但生命运动作为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又远远超出了力学的范围。当时的唯物论者在用力学解释生命的时候，企图“用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31页）这就不能不使他们的解释带上了机械论的表面性和片面性。“生命机器”自动摄食“加料”的能力从何而来？又靠谁设计、制造、安装？生物为什么会有区别于非生物的营养、生长、繁殖和刺激反应等特殊的能力？对于这一大堆难题，



他们全然无法作出回答。

机械论者陷入了困境，另一些人就从有机体各个“部件”的机械结构以外去寻找生命运动的原因。这时，德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莱布尼兹提出，生命的机体是由上帝创造的“单子”构成的，而单子自身就是能动的；单子也就是灵魂或“隐得来希”。后来，德国医生施塔尔又提出“活力论”，认为机体只是被动的物质结构，“活力”才引起生命运动。这样，生命又同物质对立了起来。

在唯心论的进攻面前，机械论无法回避生命区别于非生命的特殊性问题，却又跳不出僵死的机械论框框。于是，有多少种不能说明的生命现象便设想出多少种不同的“力”，什么感觉力、神经力、收缩力等名词一时间纷纷出现。“力”，几乎成了那些机械论者逃脱生命难题的避难所。当追溯到所有这些力的来源的时候，他们也就不能不到物质以外去寻求开动“生命机器”的“第一推动力”。这样，笛卡儿就在人脑的松果体内给灵魂保留了地位，拉美特利则较为隐晦地臆造了一个“运动始基”。其实，“运动始基”也者，灵魂的别名而已。曾经是反“灵魂说”勇士的机械论者，终于不得不向“活力论”和“灵魂说”投降了。

这是自然科学史上的一出悲剧。这出悲剧，正表明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彻底性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永世长存的“理想王国”，用孤立、片面、静止的观点去看待自然界。因此，尽管他们第一次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的方法，取得了关于生命物质性的新认识；但由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使他们看不到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和转化，在从整体上认识生命本质的时候，就抵挡不住唯心论的进攻，不能把唯物论贯彻到底。生命观上的机械唯物论者最后和唯心论同流合污，这对于今天仍然信奉“自然科学当然唯物论”的人来说，不是很值得引以为训的吗？

辩证唯物论生命观的产生

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生产促进了化学、物理学的迅速发展。细胞学说从千差万别的生物种类中揭示了共同的生命形态。进化论说明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演化。这样，就为人们进一步从物质本身的矛盾转化过程去认识生命提供了条件。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恩格



斯：《自然辩证法》第49页）十九世纪上半叶，有机化学适应纺织、染料、化肥、医药等工业生产的需要而迅速兴起。化学被应用到生命领域，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就跨进了一个新阶段。一八二八年，德国青年化学家维勒首次用氰酸铵加热制造出了尿素。原来，许多人一直认为在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存在着万丈鸿沟，有机物只有靠有机体内的“活力”才能产生。这个试验的成功，是对这种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一次猛烈冲击。而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对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辩证法则第一次取得了可靠的科学论据。接着，脂肪、糖等有机物也相继用化学方法合成。这样，就“扫除了这些所谓有机化合物的神秘性的残余”，（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75页）表明了生命物质的产生以至生命的起源，都可以经过化学的途径实现，把原来认为“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起来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4页）

化学打开了通路，自然科学就向生命的领域进军。不久，德国生物学家施莱登和施旺借助于光学显微镜，肯定了细胞是有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又在细胞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蛋白体的理论，认为蛋白体是构成一切细胞的主要物质成分；蛋白体的新陈代谢，是一切有机体生命运动的基础。这时，生物体内部的对立统一，也逐渐地被揭露出来了。

人们发现：细胞蛋白体的新陈代谢实际上是一个相反相成的物质转化过程。一方面，它不断地分解、“异化”为没有生命的简单物质，使自身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从外界摄取养料，“同化”为和自身一样的有生命的东西，以建设和发展自身。物质的转化伴随着能量的转化。代谢过程中合成有机物质需要吸收的能量，来自摄取的养料分解时释放的能量。养料来自自然界；能量归根到底也来自贮藏在养料中的太阳能。这样，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相互转化就变得十分清楚了：“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18页）构成生物体的每一个细胞以至整个有机界，实际上都是存在于自身不间断的生死转化之中。

丰富的自然科学材料揭示了生动的辩证法。虽然当时的一些自然科学家也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接触到了生命过程中的物质、能量转化。但由于形而上学的束缚，他们却把这种转化局限在化学和物理学的范围之内，不承认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也是生命运动的根本规律。因此当真理碰到他们鼻尖上的时候，还是



没有得到真理。如化学家李比希和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兹认为“生命和物质一样古老”，生命只能来自宇宙间的“生命胚种”，这就是一种根本否认生命与非生命物质可以相互转化的形而上学。生物学家巴斯德曾经用实验否定了认为非生命物质可以直接产生生命的“自生论”，但他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却得出了“生物只能来自生物”的错误论断，也完全否定了非生命物质向生命物质的转化。这些事实说明，“**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错误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43页）自然科学离开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就必然走到歧途上去。

资产阶级科学家在生命观上的迷误是不可避免的。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四起。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兴起，害怕自己的灭亡，因而他们必然否认生死转化的辩证法。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却似旭日东升，开始以万丈光芒照耀世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中，概括了当时生命科学的全部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生命观。他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反杜林论》第78页、70页）这实际上是对生命观上长期争论的一个总结。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们争来争去，不是用生命的物质性来否定它区别于非生命的特殊性；就是强调了它的特殊性，却又抽掉了它的物质性。恩格斯关于生命问题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和起源。它既肯定了生命的物质性，阐明了生命与非生命物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又指出了生命现象是蛋白体这一特定物质的运动形式，同其它物质运动形式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样就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生命同物质唯物地、又辩证地统一了起来。它使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遭到沉重打击，也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人类进一步认识生命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十九世纪化学和物理学的进展，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提供的实验观察材料是十分丰富的。但事实证明，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指导，最高明的自然科学家也没有而且不可能从这些材料中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来。这是因为辩证唯物论“**哲学具有某种即使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82页）只有它才能为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开辟广阔的前景。



生命观上的斗争在继续

二十世纪以来,在社会生产实践推动下,生物学进入了细胞以下更深的物质层次。毛纺工业为了改进产品质量,需要研究羊毛纤维蛋白的微观结构;发酵工业为了提高产量,需要弄清楚细胞内的物质代谢过程。农业上改良品种、医学上研究病菌的特性,也需要深入细胞内部探索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物质基础。同时,X光衍射、同位素示踪、电子显微镜等日益精密的技术手段,也被逐步应用到生物学领域。这样,生命过程中的分子图景就逐渐地展现到人们面前了。

原来,生命蛋白体主要是蛋白质和核酸两类大分子构成的复杂体系。细胞蛋白体代谢过程中的物质、能量转化都同这两类大分子的相互作用分不开:一方面,实现这样的转化过程要靠酶的催化,而酶就是蛋白质;另一方面,生物体内合成什么样的蛋白质和合成多少又受核酸分子的制约,而核酸自身的更新和功能的发挥又离不开蛋白质。此外,还有许多小分子物质发挥着调节和控制的作用。正是所有这些分子的相互作用,保证了生命蛋白体的化学组成成分的不断自我更新。这样,上个世纪只能在细胞水平上粗浅地加以描述的生命过程,就在分子水平上大大地具体化了。

自然科学研究的深化,进一步证实了辩证的生命过程;反过来,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武器一旦为人们所掌握,又成了推动自然科学研究的强大力量。五十年代,我国科学工作者继合成了蛋白质的原材料氨基酸之后,又进行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实验。一九六五年,在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鼓舞下,我国科学工作者根据恩格斯的有关教导,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一曲凯歌。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成功,打开了探索“生命之谜”的大门,又一次猛烈冲击了“灵魂说”、“神创论”等唯心论生命观。

现代科学提供的实践手段,从更加深刻的物质层次,暴露了生命运动中固有的各个矛盾方面。这是分析的结果。十八、十九世纪,人们通过自然科学的分析,先后看到了组成有机体的器官、组织和细胞;如今则看到了分子。分析是为了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揭示事物的普遍联系。因此分析和综合,必然相辅相成。分析愈深入,就愈是为人们从整体上认识生命创造条件。但资产阶级的科学



家却不懂得辩证法。他们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继续求助于陈旧的形而上学去解释生命科学中的新事实，并且给哲学上的旧破烂穿上现代科学的新外衣到处推销。这样，生命观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又以新的形式开展起来。

当前，“还原论”就是一种在生命科学领域内比较流行的形而上学思潮。这种“理论”认为，生命机体就是一些分子和原子的机械组合，生命运动就是分子、原子物理化学运动的简单相加。他们把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把生命运动规律归结为非生命物质的物理化学运动规律，完全抹杀了生命与非生命物质的区别。但事实上，我们从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实验中可以看到，化学合成的、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分子的运动规律就同氨基酸分子的运动规律有质的区别。自然界中的病毒，是核酸和蛋白质外壳的简单组合体。它在进入寄生细胞后，可以表现生命现象，不同于非生命物质；而在单独存在时则不表现生命现象，也不同于细胞蛋白体。病毒虽不是生物进化中从非生命向生命过渡的中间类型，但这种物质形态，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从非生命发展到生命，要经过从量到质的飞跃。人类的自觉的能动性不能还原为生物的适应性，高级的生命形态不能还原为低级的生命形态，生命更不能还原为分子和原子的物理化学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的革命精神，同疾病作斗争的坚强的革命意志，更是任何“还原论”、“活力论”永远无法解释的。“还原论”者故意抹杀这些事实，宣扬什么生命就是蛋白质和核酸分子装配起来的“化学机器”，谁只要了解它们“装配的定律”，谁就洞察了“生命的秘密”。这种“理论”，“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所造成的纯粹量的差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33页）其实也不过是十八世纪机械论的翻版。

“还原论”者还把偶然性同必然性绝对对立起来，否认地球上生命起源的客观规律。他们认为生命的产生纯粹是各种原始有机分子“偶然的巧遇”，并“算出”了这种巧遇的机会只可能出现一次。真是偶然又偶然，空前而绝后。我们不否认偶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还原论”者片面强调偶然性，实际上完全否认了地球上生命的起源是物质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后来，人们在陨石和月球上发现了氨基酸和组成核酸的嘌呤、嘧啶等物质；在星际空间发现了“有机分子云”。这些科学事实证明：构成生命物质的原材料并不神秘，只要具备了一定条件，生命就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可是，苏修一些御用学者却尾随西方科学



家之后,否认地球上生命起源的必然性,鼓吹“定向胚种论”,说什么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是由天外某个星球上的“一种理智文明”传来的“胚种”,(《哲学问题》1973年第2期)却讳言那里的“理智文明”又从何而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故意编造的这些神话,都无非是为了把生命的产生最后归之于上帝的神力。他们打着“现代科学”的招牌,宣扬早已破产了的“神创论”,这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堕落。

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在生命观上乞求于过去的亡灵,反映了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他们宣扬“还原论”,否认自然界物质运动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其目的是为了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濒临灭亡的恐怖中寻找虚假的精神慰藉。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不可阻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洪流岂能扭转。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老爷们妄图继续用腐朽没落的生命观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这只能是心劳日拙,枉费心机!

回顾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史,曾经几度“山重水复疑无路”,又几度“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迂回曲折的长期历程告诉我们:“**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87页)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使自然科学家陷入迷途。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才能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攀登新的高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自然科学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对此,应该予以迎头痛击,彻底批判。

今天,人类对生命的认识还远未穷尽,在我们面前,还摆着许多有待解开的所谓“宇宙之谜”。自然观上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总是以这些“谜”作为它的寄生之所;而剥削阶级的反动政治观又总是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相互支持,相依为命的。因此,生命科学领域内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将是长时期的。我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生命科学和一切自然科学一样,必将在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得到更大的发展,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杂 文:

莫斯科版的“升官图”

——评奇文《怎样成为部长》

桑 娄 东

旧中国有一种赌具，名曰“升官图”。一张半公尺见方的纸上，印着一些挺胸凸肚、耀武扬威的人像。每个人像边记上“官阶”，编成号码。赌棍们按图掷骰，耍尽手段，力图从“学生”开始，通过“保长”、“乡长”、“县长”……一直爬到“大总统”的宝座，赢个“满堂”，大把儿银钱钞票往口袋里装。赌场上的“升官图”正是旧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生活写照。这种肮脏的玩意儿，连同产生它的腐朽社会制度，在我国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今天，我们却在那个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看到了又一幅“升官图”。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列维科夫的蹩脚文人，秉承主子意旨，在去年十一月五日莫斯科出版的《文学报》上，抛出题为《怎样成为部长》的文章，大吹青年工人怎样升官发迹的问题。他用点题之笔，开宗明义地说：“弄清楚工人个人的官运如何，他们在官阶上能升多高，是很有趣的。”瞧瞧这篇奇文，简直令人作呕。如果把它改题为《莫斯科版的“升官图”》，那倒是恰如其分的。

据这篇文章说，某机器制造厂一个二十岁的钳工谢尔盖“一心想当部长”。这个“愿望”受到了作者的喝采，要求人们“不忙着向他泼冷水”。只要这个钳工“身强力壮，聪明能干，精力充沛，并且有上进心”，要实现“自己的未来”，是“很容易的”。不信吗？作者拿出“论据”说，前不久任命为苏联汽车工业部部长的一位大官，就是用了三十多年，从“钳工”、“工长”、“车间主任”、“经理”，一直爬上了今天的宝座的。“升官”的秘诀究竟在哪里？据作者长期观察得出结论说：部长“基本上是从副部长提升的”，而副部长“主要是从经理中选拔的”。而经理呢？主要是从持有“高等学校毕业文凭”的“专家”中“任命”的。因此，青年工人要想“爬



上比经理更高的官阶”，获得“诱人的薪额”，就必须千方百计弄到一张“高等学校毕业文凭”，这就是“升官图”的“现代化形式”。作者对此有一比喻，说“文凭”好比一张“火车票”，“凭自己的车票坐车”，由此可以沿着“领导职务的道路”，“畅通无阻”地通向克里姆林宫。否则，对不起，“火车就开走了”，那么，你的“出路”就只能在“机床、压床、高炉、自动线、组装传送带和起重机旁”。

真是妙不可言的自供状。妙就妙在这篇奇文，公然把如何升官发财作为头等大学问要人们去研究，恬不知耻地大肆鼓吹鸩山式的“做人的诀窍”：要发财必须升官，要升官必须升学。殊不知这一来，却把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种种社会丑态，把勃列日涅夫一伙的叛徒面目，暴露得淋漓尽致。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4页）看，今天苏修叛徒集团所极力宣扬的，不就是这样一套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吗？他们已堕落到何等地步，人们不难从这里得到答案。

苏修叛徒集团为什么对“工人个人的官运”突然感到“有趣”，这倒是真正“有趣”的。在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以勃列日涅夫为头目的一小撮官僚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同工人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部长”和工人，一个是嗜血如命、杀人成性的压迫者，一个是身处暗无天日的地狱中的被压迫者，他们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根本合不到一块儿去的。作者深知主子玩弄反革命两手的心计，凭着他的生花之笔，炮制了这么一个自以为令人神往的“升官图”，硬把工人和“部长”拉到一条板凳上来，用个别工人贵族当“部长”的事例粉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门面，掩盖当今苏联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诱骗工人们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拴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机器上。他们以为有了这么一着，就可以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了。莫斯科版的“升官图”，原来不过是勃列日涅夫一伙所设下的陷阱和骗局而已。

勃列日涅夫之流把工人升官发迹之道，说得口沫横飞，头头是道，那么天真的谢尔盖们的“理想”能否如愿以偿呢？能不能捞到那张进入苏修官场的“入场券”——高等学校毕业文凭呢？答曰：未必。因为统治今日苏联的，是一小撮官



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对工人怀有仇恨，剥削和奴役工人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他们特别贪婪，利用所窃据的权力，把自己和三亲六眷的子女塞进高等学校，以便日后为官做宦，成为世袭的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把一切都商品化了，什么“大学毕业文凭”、什么“学位”、“学衔”，都可以用卢布买卖。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大学校门八字开，无钱无势莫进来。广大工人、农民哪里能够象官僚们那样用成千上万的卢布去购买大学毕业文凭呢？“升官图”的实现是全靠垄断资产阶级的“护官符”来保护的，真正的“秘密”就在这里。因此，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青年工人来说，“大学”全然是一块禁地，官场更是无从插足。

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曾经是劳动人民的祖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遵照列宁的教导，大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工农兵代表被选拔到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工作，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是，标榜对青年工人个人官运饶感“有趣”的勃列日涅夫之流，却恶狠狠地诬蔑列宁开创的“选拔制度”“已过时”，为“现代科学技术所禁止”。其实，正是为他们这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禁止。他们就是这样赤裸裸地背叛列宁，背叛苏联无产阶级的。

莫斯科版的“升官图”，对苏联人民来说当然是一场骗局，但它却也反映了苏修官场腐朽不堪的现实。君不见，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不正是这样如法炮制、粉墨登场的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是个坏兵”这类鬼话被看作金科玉律，大学毕业文凭被当作进入克里姆林宫大小门槛的敲门砖，一级级向上爬“台阶”被钦定为官爵升迁的铁则。于是乎，尔虞我诈、拍马溜须、收买利诱、剽窃抄袭、雇人代笔等等丑事，在今天苏联的官场、考场则是层出不穷，无奇不有。鲁迅在评介中国清末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时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中国小说史略》）今日苏修一小撮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大官们，正用自己的丑恶行径撰写一部活生生的无奇不有的新《官场现形记》。

黑暗的尽头必是光明的来临。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正在现形，他们在“升官图”中所描绘的“花花世界”的好景不会太长了。被压在“升官图”最底层的苏联工人阶级，要革命而不是要做官，对修正主义的官禄视若粪土。他们必将高举列宁的旗帜，发扬十月革命的精神，把勃列日涅夫这伙吸血鬼从“升官图”的宝塔尖上拉下来，给予应得的惩罚。“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